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廣揚

GUANG YANG

(臨時增刊)

1960年3月30日出版

(不另收費)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編者的話

今年3月17日和18日，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先后公开审判了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案和披着宗教外衣阴谋顛复我国的美国間諜华理柱案并进行了严正的判决。

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在美帝国主义和羅馬教廷的直接策划和間諜分子华理柱的指揮下，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进行了瘋狂的破坏，对我广大神长教友的反帝爱国斗争，百般梗阻，故早为我爱国神长教友所切齿痛恨。如今，这批認賊作父、甘心出卖民族利益的叛徒得到应得的惩处，实为我广大爱国神长教友所称心如意，对政府这一正确判决无不表示万分拥护！

通过这两个案件使我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美帝国主义和羅馬教廷是我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羅馬教廷一直依附美帝国主义，充其侵略我国的工具。因此，我们必须吸取經驗教訓，百倍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对一切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要給予狠狠的打击，以回击美帝国主义和羅馬教廷。

为了进一步說明美帝国主义一貫与羅馬教廷互相勾結、狼狽为奸进行侵略的真相，特選擇了部分資料作为这个增刊的附录發表，供大家學習时参考。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目 录

坚决肃清教會內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叛国分子

狠狠打击美帝国主义和羅馬教廷顛复我国的陰謀

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审判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案十四名叛国分子受到国法制裁

披着宗教外衣陰謀进行顛复活动的美国間諜华理柱受到我国法律的惩处

河北省天主教友爱国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會議热烈拥护判处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案和美国間諜华理柱案

河北省天主教友爱国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會議決議

津市宗教界拥护惩处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和美国間諜华理柱
处判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和美国間諜华理柱上海江苏等地宗教界人心大快

呼和浩特天主教界热烈拥护惩处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

四川省天主教界一致拥护制裁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十四名罪犯和美国間諜华理柱

我們坚决拥护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对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的判处

赫脫大叫大喊为华理柱开脫

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主席皮漱石痛斥赫脫为华理柱辯护

附 录

美帝国主义和羅馬教廷是中国人民的死敌。

蒂梵岡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梵蒂岡教廷——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

今日教廷之投靠美帝

美帝之倚重教廷

“教宗”欢喜若狂地赞成美国的侵略政策

梵蒂冈与美帝国主义

梵蒂冈与美国操纵联合国

梵蒂冈支持和执行美帝国主义的各項反动政策

派契利之死和朗卡利上台前后

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案 十四名叛國分子受到國法制裁

(新华社上海17日电) 以龔品梅为首的反革命叛國集團案件，已由上海中級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审判，以龔品梅为首的十四名反革命叛國分子，分別被判处了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

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案件是在1955年9月8日被我上海市公安机关破获的。法庭审判的結果証实，龔品梅等十四名被告，是披着宗教外衣旨在顛复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重大反革命叛國集團的核心分子。这个反革命叛國集團是在美帝国主义和羅馬教廷阴谋策划下組織起来的。法庭对这些反革命分子給予国法的制裁，是对美帝国主义顛复我国人民民主政权阴谋的又一次严重打击。

3月16日到17日，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根据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分院的起訴，开庭进行公开审判。出席旁听的有上海市各界人士五百多人。

这个反革命叛國集團的十四名重要案犯是：龔品梅、金魯賢、陈哲敏、张希斌、朱树德、朱雪帆，朱洪声、陈天祥、蔡忠賢、王仁生、傅鶴洲、陈云棠、李式玉、刘季澤。法庭根据檢察机关的公訴，听取了被告的陈述和辯护人的辯护，又审查了大量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証件，証人的証信、証詞和人民群众的檢舉、控訴材料，最后在3月17日宣布了判決。

大量确凿的事实証明：这个反革命叛國集團的罪行是極为严重的。早在1948年，当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形势即将到来，蔣

介石反动統治面临崩潰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和羅馬教廷为了破坏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派遣美帝国主义分子、天主教枢机主教史貝尔曼（美国籍）和間諜华理柱（美国籍），来我国进行反革命的“应变”部署。华理柱被指派充任反动机关“天主教中央局”的秘書长，直接控制这个反动集团組織，指揮潛藏在天主教中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們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便于繼續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顛复人民民主政权的罪恶活动，决定選擇一个中国籍的反动神职人員担任主教。1950年8月，帝国主义的特务、一貫坚决反共反人民的龔品梅，在华理柱和原潛藏在中国天主教內的帝国主义分子黎培理（前羅馬教廷駐蔣帮“公使”，已被我驅逐出境）等人的策划下，經羅馬教廷批准，出任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同时，羅馬教廷又将受过长期反动訓班的金魯賢也遣返上海，协同龔品梅进行叛国活动。

龔品梅出任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后，即在帝国主义間諜华理柱和帝国主义分子黎培理、格寿平、才尔孟的亲自指使下，糾集金魯賢、陈哲敏、张希斌、朱树德、朱雪帆、朱洪声、陈天祥、蔡忠賢、王仁生、傅鶴洲、陈云棠、侯之正（已病死）、李式玉、刘季澤等为核心，組成反革命叛国集团，利用所控制的教会机构，有組織、有計劃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叛国活动。

以龔品梅为首的反革命叛国集团，由于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積極支持，他們瘋狂地进行各行各业反革命破坏活动。这个反革命叛国集团，披着宗教外衣，一貫破坏国家各項政治运动和政策、法律、法令的实施；破坏全国各地天主教徒的反帝爱国运动，迫害爱国教徒；制造和散布謠言，鼓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破坏和平运动；勾結、包庇帝国主义間諜，窃取国家机关情报；窩藏特务、反革命分子；破坏土地改革运动和鎮

压反革命运动；建立反革命秘密組織，进行特务訓練；誘騙青年教徒逃往外国；私藏槍支、彈藥和秘密电台，圖謀策应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蔣介石匪帮的复辟，等等，罪行極為严重。例如，这个反革命叛国集团曾經採取了中国人民志願軍在朝鮮部队人数、裝備、作战給养和防空措施的情况以及我国鐵路改綫的設計机密，国防工业的建設等等情报。又如他們还積極支持反革命組織“救国革命党”，在上海附近农村中建立反革命据点，阴谋組織武裝暴动。当我公安机关破获这个案件的时候，曾經在他們控制的教堂、修院、学校內搜查出这些反革命分子匿藏的槍支、彈藥、电台和国民党的反动旗帜。这个反革命叛国集团还在教堂內私設监牢，迫害教徒，修女舒海云就被无辜囚禁在牢內达十个月之久。

在大量确凿的罪証面前，被告无法抵賴。法庭在判決書中指出：以龔品梅为首的反革命叛国集团，是帝国主义用以顛复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重要工具，他們披着宗教外衣，勾結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已构成严重的叛国罪行。

法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規定，按照各罪犯的具体情节和到案后的悔罪表現，分別給予他們以应得的懲罰。龔品梅被判处无期徒刑，剝夺政治权利終身；金魯賢被判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夺政治权利八年；陈哲敏、张希斌、朱树德各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夺政治权利十年；朱洪生、陈天祥、蔡忠賢、王仁生、傅鶴洲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夺政治权利五年；陈云棠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剝夺政治权利四年；朱雪帆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剝夺政治权利四年；李式玉、刘季澤各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查获的各种槍支、彈藥、电台、黃金、美鈔等为犯罪所用的物件，一律沒收。

法庭还宣布，各罪犯的刑期，从判决的一天起算，判决前关押的日数，一日折抵徒刑一日。

披着宗教外衣陰謀進行顛复活动的 美國間諜華理柱受到我國法律的懲處

〔新华社上海18日电〕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公开审判了前已被我逮捕的美国間諜分子华理柱，并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二十年。

美国間諜华理柱犯有圖謀顛复我国人民民主政权、亲自指揮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严重罪行，1958年10月18日被我上海市人民公安机关依法予以逮捕。今年3月18日，我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根据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分院的起訴，开庭进行公开审判。出席旁听的，有上海市各界人士一百多人。

間諜分子华理柱是美国瑪利蘭州康柏蘭市人，他是一个老牌的美美国間諜。1948年5月，华理柱随美帝国主义分子、天主教枢机主教史貝尔曼来我国进行陰謀活动。当时，以从事顛复活动而臭名远揚的史貝尔曼，同蔣介石反动集团保持着密切联系，利用“演講”、“祈禱”的活动，策动反共，鼓励蔣介石的“勘乱”战争；同时，还以“巡視教务”为名，搜集我解放区机密情报，積極策划“应变”部署。史貝尔曼去后，华理柱留在中国，同羅馬教廷駐蔣幫“公使”、帝国主义分子黎培理，組織以“天主教中央局”为名的反动机构，华理柱充任秘書长，并以此为掩护进行間諜活动。

华理柱在主持“天主教中央局”活动期間，組織和指揮了隐藏在天主教中的帝国主义間諜和反革命分子，有組織、有計劃地进行顛复人民民主政权的罪恶活动。审判中提出的种种証据証实，华理柱为了配合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曾經以宗教为掩护，积极从事間諜情报活动。由华理柱領導和支持的“天主教中央局”下屬的“华明通訊社”負責人翟光华（美国籍）、“劳工法律部”負責人田执中、“文化活动部”助理田望霖、委員侯之正等帝国主义間諜和反革命分子，先后为华理柱搜集軍事、政治情报。以后华理柱又通过其他帝国主义間諜和反革命分子，搜集了我国修建軍用机場，中国人民志願軍在朝鮮部队的人数、装备、作战、防空措施，我国的国防建設等重要机密情报，罪犯为进行反革命活动所使用的密碼、密写信和情报資料等証物，都被陈列在法庭上。

間諜分子华理柱还以宗教外衣做掩护，在天主教內亲自領導和發展反动組織“聖母軍”，圖謀进行顛复活动。华理柱以“天主教中央局”秘書长的身份，領導这个反动組織的指揮中心“聖母軍办公室”，并且在上海、南京、天津等地網罗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特务分子作为“聖母軍”的骨干，其中如“聖母軍上海分会”会长沈多森就是蔣匪帮“軍統局上海国际情报站”的特务。根据被告的指示，各地的“聖母軍”分子还曾經数次抗拒登記，阻撓和破坏各地軍管会取締反动組織“聖母軍”命令的实施。

华理柱还以“天主教中央局”为活动中心，瘋狂地煽动天主教徒和神职人員，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破坏抗美援朝运动和天主教徒的反帝爱国运动，破坏我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例如在1951年正当我国人民奋起抗美援朝之际，被告与帝国主义分子黎培理共謀起草發布反动通諭，轉發羅馬教廷的反动指

示，指令龔品梅及各地区主教訂立坚决与中国人民政府为敌的“誓願書”，圖謀策应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蔣匪帮的复辟。

这次在审判华理柱案件之前，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审判了以龔品梅为首的反革命叛国集团案。审判的結果証实，这个反革命叛国集团曾秉承美国間諜华理柱所發出的大量反动指令和指示，針对我国各项政治运动，进行了一系列的叛国活动。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的全部罪行，是美国間諜华理柱所犯罪行鉄証的一部分。这些犯罪事实証实，被告是一个一貫服务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危害中国人民利益，进行顛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活动的美国帝国主义間諜分子，已經严重地违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对华理柱間諜案和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案所进行的严正审判，是对美帝国主义顛复我国人民民主政权阴謀的一次沉重打击。

在法庭上华理柱面对大量証据确凿的犯罪事实，无法抵賴，供認不諱。法庭在审判中強調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貫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是決不容許帝国主义的間諜分子以宗教外衣的掩护，从事顛复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的罪恶活动，也決不容許任何人利用宗教活动，破坏我国的政策法令。

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根据檢察机关的公訴，听取了被告的陈述和辯护人的辯护，又审查了有关案犯的口供和証人的証言，最后宣布被告华理柱有期徒刑二十年。

河北省愛國會常委會第四次會議 熱烈擁護判處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 案和美國間諜华理柱案

3月23日，河北省天主教友爱国会常务委員齐集天津市，

就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处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和美国間諜华理柱案进行座談。与会的全体常务委員一致拥护我国司法机关的严正判决，同时对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和美国間諜华理柱企圖顛复我人民民主政权的罪恶进行了严厉的譴責。与会的全体常务委員認為：我国司法机关对这批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叛国活动和間諜活动分子的惩处是正义的，也是对美帝国主义和羅馬教廷的严重打击。

会上，河北省天主教友爱国会主席、献县教区主教赵振声首先代表河北省天主教友爱国会对政府这一严正判决表示衷心拥护。他說：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是帝国主义用以顛复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重要工具，是全国人民的死敌，是教会的敗类。我国政府虽一貫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决不容許任何人利用宗教活动对我国进行破坏。赵振声主教說，我們神长教友必須从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和美国間諜华理柱兩個案件中吸收教訓；擦亮眼睛，識破美帝国主义、梵蒂岡利用宗教侵略我国的反动本質。我們要徹底摆脫梵蒂岡的一切控制。

河北省天主教友爱国会副主席、宣化教区主教常守彝严正譴責說：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和美国間諜华理柱，是一群披着宗教外衣的豺狼。

河北省天主教友爱国会副主席兼秘書长、保定教区主教王其威說：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和美国間諜华理柱受到我国法律制裁，决不是因为什么宗教問題，而是因为他們以宗教为掩护，犯下了背叛祖国和阴謀顛复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的罪行。

天津市天主教友爱国会主任委員李德培副主教列举了美帝国主义和羅馬教廷对我国进行阴謀破坏的种种罪行，最后憤慨地指出：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所叛处的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

分子和美国間諜华理柱不是什么主教、神父，而是反革命叛国分子和特务間諜。

河北省天主教友爱国会常务委員、永平教区主教藍柏露揭發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的罪行說：我教区帝国主义分子曾不断与这个反革命叛国集团研究迫害爱国教徒的办法，严重破坏了我教区的反帝爱国运动。今日痛定思痛，对这个反革命叛国集团和美国間諜华理柱感到无比憤恨。美帝国主义和羅馬教廷是我們的死敌，要与它們斗争到底。

此外，河北省天主教友爱国会副主席、正定教区主教刘安社，天津市天主教友爱国会副主委、天津神哲学院院长王洗耳，天津市天主教友爱国会副主席、河北省献县教区副主教馬光普以及与会的多位常务委員都紛紛声討了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分子和美国間諜华理柱的严重罪行，一致拥护我国司法机关給予他們的严正惩处。并且提出，要坚决肃清暗藏在教会內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叛国分子，彻底摆脱羅馬教廷的一切控制，貫徹执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針；今后要加强自我改造，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路。

會議还作出了关于拥护惩处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和美国間諜华理柱案的決議（全文另發）。

會議结束后，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局赵河洲局长在会上講話。赵局长在講話中着重分析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和美国間諜华理柱犯罪的性質，指出我国司法机关对兩案进行了严正判决的重大意义。赵局长告訴大家：从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案和美国間諜华理柱案可以看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它們就永远也不会停止对我国的阴谋破坏。因此他提醒大家要吸取教訓，提高覺悟，和一切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深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

河北省天主教友愛國會常務委員會 第四次會議決議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河北省天主教友愛國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於1960年3月23日在省会天津市舉行。會議就最近上海市人民司法機關對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案和美國間諜華理柱案的公審進行了座談。與會人員一致擁護人民司法機關對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和美國間諜華理柱案的公正判決，深切痛斥兩案罪犯的滔天罪行，並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梵蒂岡利用宗教侵略顛覆我國人民民主政權的可恥陰謀表示極大憤慨！

會議認為：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和美帝間諜華理柱是帝國主義對我國進行侵略、顛覆陰謀的重要工具。早在1948年，當我國人民革命勝利形勢即將到來的時候，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梵蒂岡為了破壞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便派遣臭名遠揚的史貝爾曼和華理柱來我國進行反革命的“應變”部署。新中國成立後，他們為了適應形勢的變化，選擇了梵蒂岡一手豢養起來的帝國主義特務龔品梅為上海教區主教，以繼續利用宗教從事顛覆活動。反革命叛國罪犯龔品梅在美國間諜華理柱和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格壽平、才爾孟的指使下，糾集金魯賢、陳哲敏等14人為核心，組成反革命叛國集團，利用所控制的教會機構，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了一系列的叛國活動。他們瘋狂地破壞國家各項政治運動，破壞各項政策法令，破壞全國各地的反帝愛國運動，到處造謠，鼓吹美帝國主義的戰爭，破壞和平，勾結包庇間諜和反革命分子，建立反革命組織，培養訓練特務，刺探軍事、政治等國家機密情報，圖謀策應美帝國主義

的侵略和蔣介石匪幫復辟。華理柱是美帝國主義和羅馬教廷派遣的披着宗教外衣在我國進行顛復活動的間諜分子。該犯利用其與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組織的“天主教中央局”反動機構，直接指揮和組織隱藏在教會中的帝國主義間諜和反革命分子，積極搜集我國軍事、政治、經濟情報，領導和發展反動組織“聖母軍”，煽動神職人員和教徒破壞我國人民革命事業，從事顛復我國人民民主政權的間諜活動，等等，與會人員對此表示切齒痛恨。

會議認為：政府判處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和美國間諜華理柱是對美帝國主義和梵蒂岡利用宗教顛復我人民民主政權的可恥陰謀的又一次嚴重打擊。美國國務卿赫脫叫喊什麼華理柱“唯一使命是宗教性的”並且把華理柱奉命在解放後潛伏中國以宗教外衣為掩護從事間諜活動說成是出於他“對他的天主教、教友的精神福利的獻身精神”，企圖以此掩蓋華理柱的罪行，開脫美帝國主義指使華理柱從事間諜顛復活動的責任。這是枉費心機，無濟於事的。我們天主教界所有的神職人員和教友深知，我國政府一向是認真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護正當的宗教活動的。但是，對利用宗教進行顛復活動的帝國主義間諜、特務和反革命分子卻是堅決不容許的。因此，儘管帝國主義善於捏造種種謊言，也是欺騙不了人的，並且只能激起我廣大愛國教徒的強烈反擊。

會議認為：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案和華理柱美國間諜案清楚地告訴我們，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梵蒂岡還在千方百計地企圖利用宗教進行顛復活動。我們所有神職人員和教徒必須加倍提高警惕，嚴格注意暗藏在教會內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的活动，隨時隨地予以揭發，檢舉和堅持不懈地進行鬥爭，堵住帝國主義和反革命分子進行破壞活動的空隙。同時，必須

深入地開展反帝愛國運動，肅清帝國主義梵蒂岡及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思想毒素，徹底擺脫梵蒂岡的一切控制，認真實現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方針並搜集當地帝國主義傳教士利用宗教侵略我國，欺壓我國人民的罪証，清算他們的罪行，以便把我省的反帝愛國運動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會議認為，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案件，有力地証明了帝國主義還時刻利用宗教進行侵略活動。同時，我們神職人員和修士、修女過去長期被帝國主義利用，受其反動影響極深，因此我們必須加強政治立場和思想的改造，必須“一邊倒”，倒向黨和人民的懷抱，大力貫徹執行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積極勞動生產做好崗位工作，經常參加政治學習，特別是對毛主席著作的學習，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我們必須嚴格遵守國家的各項政策法令，響應黨的一切號召，積極獻身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繼續大躍進，以實際行動回擊美帝國主義的可恥陰謀！

會議號召全省神職人員和教徒，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更高地舉起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光輝旗幟，深入開展反帝愛國運動，並積極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遵循着我國人民偉大領袖毛主席所指示的方向奮勇前進！

狠狠打擊美帝國主義的陰謀活動

天津市宗教界擁護懲處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和美國間諜華理柱

（新華社天津二十日訊）天津市宗教界人士十九日舉行座談，一致擁護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龔品梅叛國集團和美國間諜華理柱的嚴正判決。

到会的宗教界人士对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和美国老牌間諜华理柱所进行的一系列罪恶活动，表示極大的憤慨。天津市天主教友爱国会主任委員、天主教天津教区副主教李德培說：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和美国間諜华理柱的反革命活动和間諜活动由来已久，这些人受到法律制裁，完全是罪有应得。我們所有的爱国教徒都認識得很清楚，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懲办他們，絕不是因为他們是天主教徒，而是因为他們是反革命分子和国际間諜，是肃清敌人的問題。我們的政府一貫是維護宗教信仰自由的，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任何挑撥离間，都是白費力气。我們坚决拥护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对龔品梅叛国集团和美国間諜分子华理柱的严正审判。

天津市天主教友爱国副主任委員、天主教天津教区副主教张济众，天津市天主教友爱国会副主任委員、献县教区副主教馬光普等在發言中，表示完全拥护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对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和美国間諜华理柱的判决。张济众說，通过这两个判决，我們又一次認識到梵蒂岡这个美帝国主义侵略帮凶的猙獰面目。我們根本不承認它是天主教的首領，它是破坏世界和平顛复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政权的大本营。由梵蒂岡一手培养起来的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受到国法惩处，是对美帝国主义代理人企圖顛复我国人民民主政权阴谋的又一次打击。同时也又一次唤起了我們对美帝国主义的警惕。

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員郑錫三說，天津市基督教徒完全拥护人民法院对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和美国間諜华理柱的法律制裁。通过这一事件，进一步告訴我們，美帝国主义仍在瘋狂地利用宗教和其他卑鄙手段妄圖顛复我国人民民主政权，我們必須提高警惕，認清美帝国主义的本質，随时揭穿它的卑鄙手法，打击它的侵略活动。天津市基督教三自

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清芬等也都认为，这两个判决狠狠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是反帝爱国斗争的重大胜利，是纯洁宗教界组织的重大胜利。

中国佛教协会天津市分会副会长李慈佑、深山法师等在发言中，代表天津市佛教界完拥护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两个案件的判决。

判處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和美國間諜 華理柱上海江蘇等地宗教界人心大快

（新华社上海19日讯）上海宗教界人士和前来上海参加公审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和美国間諜華理柱案件的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天主教区及天主教友爱国会代表，18日分别在上海集会座谈，衷心拥护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个反革命叛国集团和美国間諜的判决，他们一致认为这两个判决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是給美帝国主义颠覆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阴谋又一次严重的打击。

在天主教教友举行的座谈会上，上海市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委会主任胡文耀说：我们感激人民法院对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和美国間諜華理柱的判决。从法院对他们的审判中，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完全是在美帝国主义和罗马教廷的阴谋策划下组织起来的、对我国进行颠覆活动的重要工具。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叛国集团。几年来我们坚持了反帝爱国运动，对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进行斗争，现在通过这次公开审判，我们更加看清了这个斗争的必要性和对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我

們要在黨領導下，把反帝愛國運動進一步開展起來，堅決走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

八十多歲的天主教上海教區代主教張士琅在座談會上發言說：“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在美帝國主義和羅馬教廷的共同策劃，並且在美國間諜華理柱親自指揮下，陰謀推翻我國人民民主政權；這是中國人民絕對不能容忍的滔天罪行，現在這樣判決是完全正確的。

上海市徐家匯天主堂神甫張家樹說：這次公開審判，使教友們進一步認清了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的反動罪行，認識到羅馬教廷實質上是美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更加堅定了我們進行反帝愛國運動的信心和決心。我們一定要提高警惕，在黨的領導下，繼續開展反帝愛國運動，發揮我們的積極性，為建設社會主義貢獻力量。

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付主席、南京教區主教李維光和江蘇省天主教友愛國會付主任汪皓都在座談會上嚴正指出：對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和美國間諜華理柱的審判再一次證明，美帝國主義是我們最凶惡的敵人，羅馬教廷是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他們要想利用天主教作為反對我們國家的工具，使我們永遠受其擺布，他們的算盤打錯了。我們必須與羅馬教廷劃清界限，加強自我改造，堅持走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這是任何外來的力量改變不了、動搖不了的。

上海市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委會付主任湯履道在發言中，特別強調指出，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雖被粉碎，美國間諜華理柱雖已依法判決，但帝國主義決不會就此罷休，我們天主教友還必須努力清除過去長時期所受的羅馬教廷和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思想毒素的影響，高舉總路線紅旗和反帝愛國旗幟，直到這一鬥爭取得完全勝利為止。

安徽蚌埠、江苏徐州、浙江温州等地天主教区主教及上海的神父、青年教友和修士等也都在会上愤怒指斥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和美国間諜华理柱的滔天罪行。

上海的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等宗教界人士在18日也举行座談会，一致拥护人民法院的判决。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吳耀宗在会上愤怒地说：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所进行的活动，绝对不是什麼宗教活动，而是美帝国主义和羅馬教廷指使下的反革命叛国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来，党和政府一贯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凡是正当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都受到保护。我們宗教界也受到了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但是我們絕不能允許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来进行反动活动。他表示完全拥护人民法院对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和美国間諜华理柱的判决。

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閘北堂牧士謝永欽，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靜安寺方丈持松，上海市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員，白云在主持楊祥富，上海市伊斯蘭教教长馬人斌等許多宗教界著名人士，都先后在会上發言，一致認為人民法院对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和美国間諜华理柱的判决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完全符合于广大人民的利益和願望。他們感謝政府为完成宗教界清除了一批敗类，也使得广大教徒更加認清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真面目，受到一次深刻爱国主义教育。他們表示一定要加强学习，努力自我改造，永远听共产党的話，走社会主义道路。

呼和浩特天主教界熱烈擁護 判處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

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判處了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分子的消息傳到呼和浩特市以後，呼和浩特教區天主教友愛國會、呼和浩特市天主教友愛國會當即召開教區和市愛國會委員聯席（擴大）會議，對以龔品梅為首的反革命叛國集團進行了嚴厲的聲討，對我國司法機關依法判處龔品梅等十四名反革命叛國分子的嚴正措施表示熱烈擁護。

呼和浩特教區天主教友愛國會付主任高飛林神父認為：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在美帝國主義和羅馬教廷的指使下，堅決與中國人民為敵，喪心病狂地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破壞我國天主教反帝愛國鬥爭，實屬罪惡滔天。我國司法機關給他們以懲處是完全必要的。高飛林付主任號召大家要提高警惕，不能麻痹大意，從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案件中吸取教訓。呼和浩特總教區王學明總主教在會上發言，憤怒譴責了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的罪行，並完全擁護政府依法判處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分子的嚴正措施。王學明總主教說，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忠心耿耿地聽從美帝國主義和羅馬教廷指使，從事各種叛國陰謀活動，他們已經沒有一點中國人的氣味，他們是一群披着宗教外衣的豺狼。此外，與會的其他神長、修士、修女等均紛紛發言，一致揭發譴責了龔品梅的反革命叛國集團的罪惡，表示今後要努力學習，提高覺悟，堅決肅清帝國主義和羅馬教廷的遺毒，給美帝國主義和羅馬教廷以更沉重的打擊。

（呼市愛國會）

四川省天主教界一致擁護制裁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十四名罪犯和美國間諜華理柱

四川省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於3月20至21日就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和美國間諜華理柱兩案舉行了座談。出席座談會的有我省各教區主教、代主教、付主教和部份神父共21人，座談中與會人員一致衷心擁護人民政府對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和美國間諜華理柱的嚴正判決，大家認為：這兩案的判決是大快人心的事，是給美帝國主義和梵蒂岡教廷顛覆我國人民民主政權的應有的打擊，是我們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的又一次重大勝利。

在座談會上，省天主教友愛國籌委會常委，宜賓教區主教王炬光說：“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和美國間諜華理柱受到中國人民的正義制裁，是給予美帝國主義和梵蒂岡教廷利用天主教在我國進行陰謀顛覆活動的應有打擊，判決正告美帝國主義和梵蒂岡：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穩如泰山堅如磐石，帝國主義者的任何陰謀顛覆活動，都不會得逞，必然遭到可恥的失敗。”省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委會常委、成都教區付主教李道揆說：“美國間諜華理柱和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受到罪有應得的判處，這是為我們天主教除掉了大害，我是衷心擁護人民政府對這兩個反革命案的正義判決。”神甫琅佐說：“上海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和成都的李文景反革命集團互相結成一氣，從事叛國的陰謀破壞活動，它們都是美帝國主義和梵蒂岡教廷長期豢養的祖國的叛徒，教會的敗類。我們愛國的天主教神職人員和廣大教徒群眾絕不容忍它們的叛國罪

行，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对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和美帝国主义間諜华理柱的正确判处。同时，我們还必须时刻提高警惕，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梵蒂岡教廷利用天主教在中国进行政治阴谋破坏。”省天主教爱国会筹委会主任委員，万县教区主教段蔭明在座談会中說：“我衷心拥护人民政府正义判处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和美国間諜华理柱的徒刑，”段又說：“事实証明：梵蒂岡教廷和美帝国主义一样是我們中国人民的死敌，我們天主教徒必須和梵蒂岡教廷割断一切关系，并对它进行不懈的斗争，只有这样，我們中国天主教才能走上真正独立自主的道路。”乐山教区主教邓及洲一再表示，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对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和美国間諜华理柱的严正制裁，并說：“通过这两个案件的判处，使我們进一步認清了梵蒂岡教廷的反动本質，和美帝国主义的咀臉，我更坚决和梵蒂岡教廷割断一切关系。”神甫刘宗漁在座談会上說：“龔品梅不是什么主教，他是祖国叛徒，教会敗类，人民政府对他的判决是完全正确的。梵蒂岡教廷指使龔品梅反革命集团进行叛国活动，我們爱国的天主教徒对此表示極为憤怒，为了保衛祖国，保衛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我們天主教界必須經常提高警惕，严防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因此，我們中国天主教必須与梵蒂岡教廷割断一切关系。”

通过座談，大家进一步認識了梵蒂岡教廷和美帝国主义都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一致認為：正当我們爱国的天主教徒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建設我們社会主义的时候，仇視我国人民革命胜利，忘圖顛复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的美帝国主义和梵蒂岡教廷是决不甘心它們在中国的失敗的，它們将会千方百計地利用中国天主教內的殘余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我們中国天主教界人士，通过人民政府对龔品梅反革命叛国案和美

國間諜華理柱案的判處，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我們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致表示：今後要進一步深入開展反帝愛國運動，徹底擺脫梵蒂岡教廷對中國天主教的一切控制，並在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上闊步前進。

（四川省天主教友愛國籌備委員會）

我們堅決擁護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對 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的嚴正判處

我們從報紙上看到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判處的消息，這實在是大快人心的事情。我們對政府這一嚴正措施表示堅決擁護。

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在美帝國主義和羅馬教廷陰謀策划下，建立反革命組織，有組織、有計劃地陰謀顛覆我國人民民主政權，搜集情報，破壞國家各項政治運動和政策法令，猖狂地破壞中國天主教的反帝愛國運動，製造和散布各種謠言，忠實的為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與戰爭政策服務，企圖使美蔣反動統治復辟。我們對這些認賊作父、賣國求榮的反革命黑幫憎恨萬分，他們受到國法的懲處，完全是罪有應得。

從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的案件中，我們又一次清楚地看到羅馬教廷為美帝國主義侵略政策服務的反動本質。羅馬教廷的指令，實際上就是美國壟斷資本家的意旨。為了維護祖國的安寧，維護世界和平，我們決不能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再利用天主教進行侵略活動。我們要百倍地提高警惕，與一切帝國主義和反革命分子特別是反動透頂的羅馬教廷進行無情的鬥爭。堅決貫徹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方針，徹底擺脫羅馬教廷的一切控

制。我們要堅決擁護黨的領導，永遠聽毛主席的話，並努力加強自我改造，從事勞動鍛煉以無產階級的政治思想為統帥，徹底地破資本主義思想，立社會主義思想，高舉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為祖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貢獻力量。

西安市天主教友愛國會主任 高宗才

西安市天主教友愛國會付主任 寇禎祥

西安教區代理主教 姬懷讓

西安教區神父 劉德雨

西安教區神父 鄭伯祿

西安教區神父 龍德壽

西安市天主教友愛國會委員 張佑賢

西安市天主教友愛國會委員 劉峻德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九日

我判處美間諜刺痛美政府

赫脫大叫大喊為華理柱開脫

〔新華社19日訊〕華盛頓消息：中國司法機關對美國間諜分子華理柱的審判揭露和打擊了美帝國主義顛覆中國人民民主政權的陰謀，美國政府因此大為惱火。

美國國務卿赫脫18日發表一篇聲明，企圖掩蓋華理柱的罪行，從而替指使華理柱從事間諜顛覆活動的美帝國主義開脫責任。赫脫叫喊什麼華理柱是“一個無辜的美國公民”，“他的

唯一使命是宗教性的”，并且把华理柱奉命在解放后潜伏中国以宗教外衣为掩护从事間諜活动說成是出于他“对他的天主教教友的精神福利的献身精神”。但是赫脫对于中国法庭判处这个老牌美国間諜所依据的証据确凿而且华理柱本人也已供認不諱的具体罪行，在他的声明中却完全不敢触及。

赫脫还声言美国要在华沙中美大使級会談中就 此 无 理 取 鬧。他說，他将指示美国駐波蘭大使在下一次中美大使級会談中提出“最强硬的抗議”。

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主席皮漱石發表談話 痛斥赫脫爲华理柱辯護

〔据新华社22日訊〕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主席、沈阳总教区总主教皮漱石今天發表談話說：美国国务卿赫脫为美国間諜分子华理柱进行辯護的无耻声明，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坚决敌視新中国的凶惡面目。

皮漱石在談話中，表示完全拥护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对美国間諜分子华理柱和龔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的判決。他說，正由于中国司法机关的判決，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顛复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陰謀，美国政府恼羞成怒，国务卿赫脫便急忙亲自出馬，發出了所謂“声明”。但是，他的“声明”不敢触及任何事实，这真是作賊心虛。

梵蒂岡爲美帝國主義服務

美国对梵蒂岡战后的全部活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梵蒂岡在現代一切根本問題上所持的立場，完全符合英美帝國主義者的方針，并且首先是为美国的壟斷組織的利益服务。

覬覦世界霸权的美国野心家，很需要有人为自己的野心作思想上的辯护。由梵蒂岡統一領導的天主教会，併命追求天主教獨霸全世界的地位，而以宗教的腔調喊着世界主義的口号，这么一种宗教組織正是为美国壟斷資本家帝國主義計劃作思想上辯护的最合适的工具。远在战争期間，美国刊物上就提出了以美国作为天主教中心并由美国人担任“教皇”是否已到時候的問題，这决不是偶然的。

美帝國主義者妄想教欧洲人民，即他們力圖將之淪为自己的奴隶的欧洲人民，教他們相信美国壟斷資本家的强盜活动是对备受战禍的人民的福利“大公无私的关怀”的表現。美帝國主義者需要梵蒂岡充當他們在反共反民主斗争中的帮凶，充當他們反苏宣傳中的同盟者，充當他們奴役南美各国的爪牙。在近东方面，美帝國主義者也正广泛地利用梵蒂岡的关系、組織和支持。美国主教萊阳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写道，梵蒂岡与很多国家特别是南美各国的統治集团有着千絲万縷的联系；梵蒂岡的代表們如果“接到梵蒂岡要他們与泛美运动合作的訓令”的話，那他們对于南美国家与美国接近的事情上是会大有用处的。梵蒂岡，——萊阳繼續写道，——是世界上消息最灵通的一个組織。它拥有数以千計的訓練有素的官方与非官方人物，

特別是外交家，在為自己服務，為自己蒐集情報；這樣，它就擁有世界上最完備的特務機構了。萊陽主教在所寫文章的結束語中說道，美國要想為自己的利益來利用這個特務機構，唯一的辦法是和教廷建立外交關係〔1〕。他厚顏無恥地說，凡是在加強與梵蒂岡聯繫的一切國家，所追求的就是政治目的而不是宗教目的。“如果以為德國、法國以及英國承認梵蒂岡是出自崇高的基督教慈悲心，他寫道，——那就大錯特錯了。它們如果有所給予的話，那它們也一定是希望有所得的。”

梵蒂岡本身，為實現其反人民計劃，也需要有可靠的支柱。不久前它認為這個支柱就是法西斯制度。但這個支柱垮台了。戰後，美帝國主義者成了國際反动派的頭子。於是梵蒂岡就把它當作了自己的同盟者。天主教會在歐洲失去了很多陣地。它與法西斯匪幫勾結的事實，使千百万天主教徒看穿了主教們與“教皇”的真面目。梵蒂岡既然在歐洲失去了很多陣地，也就努力想把它在西半球的地位鞏固起來，在這一半球內，美國約有二千五百万天主教徒，南美各國也有很多信奉天主教的居民。

梵蒂岡規模龐大的政治活動，需要浩大的經費。西歐各國的天主教徒，戰後已無力再像從前那樣向他們的“宗座”大量進貢了。但有美國資產階級在一天比一天慷慨地資助着“教皇”。據報載，梵蒂岡百分之八十的收入是來自美國和加拿大。遠在一九四二年，美國就已經成了天主教一個傳教的世界中心。很多梵蒂岡的學校是用美國的錢辦的。由於在物質上依賴美國富豪，因此梵蒂岡與美國統治階級的勾結也就越發緊密起來了。

一九四六年二月，教皇以任命一批新的紅衣主教的行動，着重地表明了它的親美方針，在這批新紅衣主教當中有四名是美國人，其餘是其他各國的人，但也都是在仇視民主和共產主義、勾結美國方面的臭名昭彰的人。美國共產黨雜誌論及任命這

批新紅衣主教的举动时写道：“梵蒂岡既然这样坚决指靠更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那就可以想像得到，教会今后一定要为美帝国主义的利益而卖力了。”〔2〕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泰勒受命为美国总统駐梵蒂岡的私人代表，因为根据美国宪法中政教分离的規定，是不容許美国政府与“教皇”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的。用这种方法还可以避免美国其他基督教会反对美国与天主教首脑建立关系的許多抗議。泰勒的这个总统駐梵蒂岡代表的职位（大使銜），一直保持到战后。泰勒——是美国大資本的代表，是那統治着美国的“一千个美国人”的代表。他与摩根銀行有密切联系，还做过美国最大的“鋼鉄托拉斯”的經理。他是“墨索里尼的帮凶和法西斯主义的傳声筒”〔3〕——这是著名美国評論家賽德斯对泰勒为人的評語。泰勒頌揚墨索里尼政府，为其“成功”而狂欢；特別是贊成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亞的行为。倫敦“工人日报”写道，泰勒在梵蒂岡的崗位是“美国第五縱队在欧洲大本营之一”〔4〕。

事实上也是如此，这位駐教廷的美国銀行家代表，仅在一九四八年內就担任了西班牙与葡萄牙（訂軍事同盟）、佛朗哥与西班牙皇位覬覦者（計劃复辟）的中介人。他偕同“总统特派使节团”去过巴黎的倫敦。他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对意大利的选举直接施以压力，想使天主教党获胜。泰勒的这一切活动上得到了梵蒂岡及天主教高級教权阶層的多方支持。根据报纸透露出来的消息，在泰勒的参加下，美国与梵蒂岡签订了关于美国資助梵蒂岡进行反民主、反共活动的秘密协定。

由于美国人在梵蒂岡教廷中，特别是在它的外交机关中起着领导作用，因而“教皇”对美国資本家的依附关系就更加紧密起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教皇”委派很多美国主教充任

教廷駐在美国資本家所特別垂涎的一些国家的聖使（大使）。例如，把孟克主教派駐西德，把哈尔萊主教派駐南斯拉夫。前面已經講过，孟克一方面是“教皇”駐西德代表，另一方面又是美国陸軍部的代表。哈尔萊主教是梵蒂岡的老牌外交家〔5〕，战前曾任“教皇”駐日本的代表，后来在梵蒂岡工作，专与泰勒联系。一九四〇年“教皇”任命他为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主教。战后，哈尔萊又作过“教皇”駐巴尔干各国外交代表。在梵蒂岡的外交工作人員中間有不少是美国的主教和官員，于是美帝国主义就得以利用教皇的外交来协助推行自己的政策。很多的事实証明，所謂梵蒂岡的“情报中心”、傳教会、耶穌会及其他团体，都执行着美国特务机关間諜任务。

在为美帝国主义利益而利用梵蒂岡及其一切組織的勾当中，“教皇”庇护十二的亲信紐約紅衣主教斯培尔曼起着特殊的作用。斯培尔曼也是梵蒂岡的老牌外交官——曾在梵蒂岡国务院里任职多年。他作过波士頓天主教報紙“向导报”的主編。在他的参与下梵蒂岡改組了自己的新聞处，使这个机构成为制造和販卖謠言的大企业。斯培尔曼本人也不断發表充滿污蔑民主和苏联的謠言的文章。他是一个有名的亲法西斯分子。战前，他协助过“教皇”来消解梵蒂岡与墨索里尼政府之間的誤会。今天，斯培尔曼是法西斯匪徒佛朗哥的热心崇拜者。一九四三年他到西班牙会見過佛朗哥。他所發表的有关这次西班牙之行的文章，对佛朗哥这創子手恭維备至，而对西班牙共和政府人士則極尽誣蔑之能事。他的教区報紙写过，說是佛朗哥不偏不倚正是“站在天使的一方”作的战。

战时，斯培尔曼担任过美国軍隊中随軍神父的領導人。当时梵蒂岡与美国反动势力为挽救歐洲的法西斯制度，曾派斯培尔曼同情戴高乐，因而極力想把法国的右翼分子糾集在戴高乐

周围，用以窒息民主运动。

在美国，斯培尔曼是反左翼組織、反国际民主以至反苏宣傳运动的一个主要組織者。一九四八年夏，他奉美国統治集团之命到过日本和中国。作为美帝国主义極端反动方針的拥护者的斯培尔曼，在一九四八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間，他所支持的就是反动的集团的代表、候选人杜威。作为美国有錢有势的天主教会的代表，紅衣主教斯培尔曼能够影响梵蒂岡的活动方針。他在梵蒂岡的势力是如此的强大，以致某些資产階級作家認為他将成为“教皇”或梵蒂岡国务卿的繼任者。

“教皇”无条件拥护美帝国主义奴役欧洲的“馬歇尔計劃”。“羅馬观察家报”总編輯戴拉托列伯爵曾写道：“我們信任馬歇尔計劃”。他說馬尔計劃“因其內在的真理而光芒四射”〔6〕。梵蒂岡也拥护“杜魯門主义”——即美国“援助”土耳其与希腊的計劃。一九四七年八月，泰勒帶給“教皇”一封杜魯門的亲笔信，信中說的是在反民主的斗争中及在实现美国反动的帝国主义計劃中美国与梵蒂岡合作的計劃。庇护十二在其复信中表示贊許“杜魯門主义”，并同意天主教会与美国統治階級实行合作。

“教皇”也拥护并称頌北大西洋公約这个美国所組織的目的在于反苏及反人民民主国家的軍事联盟。

美帝国主义以假仁假义的慈善为名而行其奴役欧洲各国人民的計劃之实。它在欧洲各国的走狗們，从亲法西斯政治家起到社会党右翼領袖止，都支持着所謂美国富豪“慷慨无私”这种神話。梵蒂岡也和他們一起，帮助美帝国主义者进行这种撒謊勾当。“教皇”称頌美国資本家的“慷慨”和“无私的仁爱”，彷彿他們純粹是以人道为怀而努力“帮助”欧洲人民似的。假如注意到，甚至資产階級的报章也日益頻繁地發出这样

的呼声，說是美国的这种“援助”正在导致西欧各国的經濟衰落和它們对美国的依賴性的日益加甚，假如考虑到这个事实的話，那末就可看出“教皇”对美帝国主义者“善行”的虛伪頌揚，显然証明着梵蒂岡和美帝国主义者的勾結是已到多么紧密的程度了。

一九四七年五月，“教皇”接見了美国紅十字会的代表，并对这一組織贊揚备至，特別是贊揚它与梵蒂岡的合作。他当时說，欧洲在物質上的破坏很快就能恢复；因而他最就心的乃是“道德上的破坏”。他所謂“道德上的破坏”，归根到底无非是指革命运动的高漲。“教皇”号召美国人給予欧洲各国人民以“精神援助”，这所謂援助便是协助反民主的斗争。美帝国主义者今天所給予人們的也正是这种“精神援助”，即煽动反共的歇斯底里，挑撥对苏联的敌意，到处支援凶恶的反动势力。

美国統治集团代表人物造訪梵蒂岡的时候越来越頻繁了。一九四五年夏季，“教皇”接見美国国会海軍各委员会的代表。在欢迎辞中，“教皇”号召美国海軍起来保障各国人民中間的“基督教和平”（用美国干涉欧洲內政的办法）。美国的特务头子蒲立特，也見過“教皇”。一九四六年，“教皇”在梵蒂岡接見了亲法西斯分子、前美国邮电部长大資本家法萊。一九四七年二月，美国最富侵略性的集团的代表胡佛，也見過“教皇”。同年三月間，“教皇”接見了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史塔生。七月間，以仇視苏联著名的当时美国商业部长哈里曼，也到过教廷。同月間“教皇”接見了日內瓦国际劳工局美国代表团。他照例大肆攻訐共产主义，同时向代表团保証說，天主教会是“关怀工人利益”的，不过工人无论如何却不應該侵犯資產階級的財富。

一九四八年七月，美国国务院的代理人及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为了策划分裂意大利职工会而来到罗马。“教皇”和他們一起核定阴谋破坏意大利全国总工会的计划。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八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为迫使意大利订军事协定来到罗马；次日“教皇”接見了他。一九四九年二月間，美国海軍上将塞尔曼来見“教皇”，七月間美国财政部长史奈德进过教廷。

梵蒂岡的領導人物个人方面也和美国統治階級的代表們有勾結。据为庇护十二作傳的天主教傳記家的記載，一九三六年派契利紅衣主教（即当今的庇护十二）到美国时，就住在銀行家布雷德的公館里。这家銀行財閥和梵蒂岡高級教权階層一直保持着很友好的关系，“教皇”曾封布雷德妻子为公爵夫人。美国貴族階層中間，随着这一階層之日趋反动，傾向天主教的人越来越多了。

美国資本家目前正广泛地利用着教会組織来維護自己的政权和財富。美国几种主要的教会の上層人物都和大資本家打成了一片。战争販子杜勒斯在很多美国新教教会中起着領導作用。一九四五年一月間这些新教教会召开會議时，杜勒斯就是关于战后設施問題的主要报告人，他在会上大事宣傳战后美国扩张主义夺取世界霸权的计划。

最近几十年来，天主教会的势力在美国大大地增长起来。天主教徒（大多数是外国侨民——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波蘭人等）主要地是集中在大城市。資產階級利用天主教团体来分裂工人階級，極力阻撓劳动者天主教徒参加工人运动，唆使他們反对共产党人。为“教皇”于一九四六年二月擢昇为紅衣主教的四个美国主教当中有底特律大主教慕奈。底特律是美国汽車工业的中心，是福特的王国。福特一向广泛地利用着教会組

織來與工人運動進行鬥爭。僧侶們都拿着他的薪俸。一九三七年“教皇”在底特律設立了大主教區，並派他手下經驗豐富的代理人慕奈來掌管。慕奈曾在梵蒂岡擔任過多年的外交職務，做過“教皇”駐印度和日本的代表。

慕奈任大主教以後便開始進行分裂職工會，在其中培植天主教的反動分子。為此他在一九三七年主持成立了一個“天主教職工聯合會”（7），並創辦神父訓練班，讓他研究工人問題，亦即研究對付工人革命運動的方法。慕奈在各職工會內所建立的天主教小組成為反動勢力的嚮導。一九四八年總統選舉運動期間，“天主教職工聯合會”會員破壞過進步黨總統候選人華萊士（此人現已墮落——譯者）的群眾集會。華萊士在某次演說中說：某些美國人士正在進行一種令人擔憂的企圖，即利用宗教上的分歧來達到政治上的目的……。有時宗教被利用去掩飾反動的政治目的，有時被那些力圖保全自己的財富與特權的經濟界人士利用作為他們的儀裝”（8）

賽德斯寫道，在美國“大資本也打進了宗教領域。全國製造商協會有一個特殊而非常活動的宣傳部門叫做“制協與教會合作委員會”，其目的在使生意經和宗教活動打成一片。一九四四年‘制協’的年鑑里，坦白地說明了進行這各教會工作的目的：‘教會工作者與企業家通常對於為美國謀福利都具有共同的觀念，但是由於他們美此所見不同，常蒙蔽了這種基本的一致性，有時並且引起雙方彼此動機的誤解，制協通過它的宣傳機構‘已經成立了几百個制協與教合作委員會，並組織了許多地方上的教士與企業家的會議，’。（9）

受到統治階級支持的美国天主教高級僧侶，覬覦着全國的領導地位。這種情勢引起大多數居民的抗議。美国天主教教權階層擁有龐大的宣傳機構、訓練有素的幹部和大批的金錢，數

达四万的神父、一万五千余座教堂、许许多多的群众性团体、几百种定期刊物、几百所学校、几百个布道组织，最后，还有金融资本和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财产——这一切就使天主教会成了反动势力的有力支柱。天主教会是美国法西斯主义的组织者之一。法西斯匪党头子和种族主义的宣传者神父柯弗林，也和慕奈一样，是出身于福特王国，是在底特律起家的。他虽然也是福特所豢养的一个家伙，但最初他干的却是假意攻击银行界和工业界的蠢感勾当。然而，很快他就丢掉假面具而公开地宣传法西斯主义了。他的组织“基督教阵线”与下列各个法西斯的天主教团体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哥伦布骑士”，美国军团，“美国天主教退伍军人会”等。柯弗林起家时本是个普通神甫，现在已成为大财主了。

美国天主教会的高层分子是美国垄断资本所进行的反苏运动的开路先锋。因此他们便特别受到美国老板的宠爱。

天主教人士在美国国家机构里的影响，特别是在华尔街财阀所领导的国务院里的影响日益增长着。在国务院里的反动派中间，那些与美国天主教权阶层及梵蒂冈有联系的人物起着很大的作用。斯梯尔写道，在国务院里，“目前大多数的领导职位都被那些在思想上非常接近梵蒂冈的人物所占据着”（10）。美国参议员泰勒（一九四八年总统选举时进步党所提出的副总统候选人）说过，美国国务院人员的成份，除了其他的反动分子之外，“全是追随法西斯分子柯弗林神父的天主教徒”（11）。前德国总理、天主教领袖布吕宁，过去担任过现在还担任着国务院德国问题专家。国共产党杂志论及教权派分子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时写道：“教权派法西斯势力日益深入地打进国务院，打进它在华盛顿的职员中间，打进它的大使和特务人员中间。”（12）据该杂志所列举，除了其他外交官，属于这一伙的

有海軍大將列希、卡爾頓·海斯（前美國駐西班牙大使，佛朗哥的热心崇拜者）、羅伯特·繆菲（前地中海戰場盟軍總指揮部政治顧問；一九四九年開始主持國務院德奧司）等人。

美國外交機構里的這批天主教反动人物，正在促使美國統治階級與梵蒂岡之間聯繫的加強，以利于美國壟斷資本。天主教反动分子在美國陸軍部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梵蒂岡在南美也充當着美帝國主義者的幫凶。大多數南美國家都有外交代表駐梵蒂岡。梵蒂岡支持着南美各國的反動派和法西斯分子。下面舉的例子可資說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阿根廷建立了庇隆將軍為首的法西斯獨裁。于是一切政黨馬上被取消。天主教宗教課規定為一切中小學校的必修課。梵蒂岡與庇隆政府之間形成了極其友好的關係。一九四七年六月，庇隆的妻到西牙去拜訪法西斯匪徒。她在西班牙營到很隆重的招待；這位庇隆夫人對佛朗哥法西斯政府傾吐了她內心的同情。接着她到了羅馬。在羅馬她遭到了當地勞動人民的仇視，當她到達羅馬的時候，當地曾舉行反法西斯示威遊行。但在梵蒂岡人們却很親切地招待她，而且“教皇還予以接見。就在這個時候，“教皇”以高綬勳章授庇隆。

目前美帝國主義正力圖依靠天主教教權階層和梵蒂岡來達到它獨霸南美的目的。據華盛頓天主教大學教授萊陽說，由美國去南美工作的天主教傳教士，在南美各國的教會中占有很大的勢力。他們常常召開美洲天主教會議，美國天主教代表常常參加南美各國天主教代表大會。

梵蒂岡已和美帝國主義者緊密地勾結在一起了。它今天正列身于世界新戰爭挑撥者陣營。在梵蒂岡的機構內，華爾街的走卒們作用正一天天地大起來，他們為着一小撮美國壟斷資本家的利益而利用着天主教徒的宗教感情。他們也正在廣泛地利

用梵蒂岡的机构来进行間諜活动。

註

釋

- (1)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二日“紐約时报”。
- (2) “政事月刊”，一九四六年四月紐約版，第三一八頁。
- (3) 賽德斯著：“一千个美国人”，苏联外国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八年俄譯本，第二九四頁（參閱世界知識社一九四八年版“豪門美国”第二五二頁。——譯者）。
- (4)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日倫敦“工人日报”。
- (5) Th Morgan著：“The Iiztening Pozt”一九四四年紐約版，第一八一頁。
- (6)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紐約时报”。
- (7) 一九四六年第四期“Gurrenf Riography”，第三九一一四一頁。
- (8) 一九四八年六月九日“真理报”。
- (9) 賽德斯著：“一千个美国人”，苏联外国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八俄譯本，第二四九——二五〇頁。
- (10) 一九四八年七月五日“真理报”。
- (11)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真理报”。
- (12) “政事月刊”，一九四六年四月紐約版，第三二一頁。

梵蒂岡教廷——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

羅馬的梵蒂岡教廷是人所共知的策划反苏反人民陰謀活動的中心之一。它的全部歷史說明：它熱心於以一切方式支持奴役與壓迫各國人民的反動勢力。梵蒂岡教廷早已公開拋棄單純的宗教立場，違背天主教徒群眾的利益，而成為美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馴服工具。

自一九二九年教皇與意大利政府簽訂拉特蘭條約，獲得梵蒂岡宮殿區的所有權以後，梵蒂岡就建立了一個面積僅四十四公頃的教皇國家。它在世界各重要國家設立教區，派遣主教，享受治外法權，並與各資本主義國家互派使節，採用這些方式與各國反動勢力勾結，從事反人民的活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梵蒂岡就積極支持意大利法西斯蒂黑衫黨徒的活動。一九二二年表墨里尼獲得政權後，教皇庇護十一世贊頌這個屠殺意大利人民的劊子手為“天主揀選給我們的人”。梵蒂岡也曾積極支持墨索里尼對阿比西尼亞的野蠻進攻，支持佛朗哥在西班牙的血腥屠殺，支持希特勒納粹政權併吞奧地利、割取斯洛伐克、進攻波蘭、法國以及蘇聯的一連串侵略行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久，庇護十二世還曾和墨索里尼訂立了“共同抵制共產主義”的秘密協定。在整個戰爭期間，德、意、日三國的秘密使節曾不斷前往梵蒂岡，進行陰謀活動。在法西斯集團崩潰的前夕，教皇又多方游說英、美和德、意妥協，共同進行反蘇戰爭。在東方，梵蒂岡以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盟友自居。在二次大戰中，梵蒂岡教皇為了進一

步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結，竟承認日本战犯天皇裕仁所信奉的神道与耶穌教义并无二致，同时，在东京还派駐了教廷使节。法西斯軸心崩潰以后，梵蒂岡教廷絲毫也沒有放棄其仇視各国人民的立場。它一面竭力庇護雙手染滿欧洲人民鮮血的法西斯战争罪犯，一面投靠作为世界反动陣营的新主子美帝国主义，为华尔街的侵略目的服务。

梵蒂岡教廷和反动的华尔街垄断資本的联盟，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的。梵蒂岡教廷所拥有的巨大財富，据估計价值达三十亿美元。它在意大利拥有四十六万多公頃的土地以及无数的宮殿和住所。梵蒂岡的投資遍及意大利的各个經濟部門。不仅如此，它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阿根廷、巴西等国也握有股票、土地与財產。它还是美国“辛克萊石油”托辣斯、“安那样康达銅公司”和其他托辣斯的股东之一。目前，梵蒂岡的收益百分之八十来自美国和加拿大。意大利共产党总書記托里亞蒂曾經指出：梵蒂岡教廷“已和腐朽的資本主义社会的領導势力更密切地結合起来。它不是变成了大資本的附庸，而是变成了大資本的一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垄断資本对梵蒂岡的控制日益加强。早在第二次大战期間，美国总统駐教廷的私人代表、摩根財閥集团中的一員——梅隆·泰勒，就曾为新的梵蒂岡——华尔街軸心奠定基础。在这期間，声名狼藉的紐約总主教斯培尔曼也曾先后六次前往当时是敌国的意大利，和梵蒂岡商談未来的兩國合作問題。这个經營“可口可乐”与煤油托辣斯的紅衣主教，在梵蒂岡的領導机构——枢密院中已享有越来越高的权势。

战后的种种發展証明：梵蒂岡已成为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狂热支持者。一九四七年八月，杜魯門曾致函教皇庇護

十二世，要求共同与共产主义进行斗争，教皇答应要加强教会组织，以进行反对共产党与人民民主运动的斗争。“馬歇尔计划”通过以后，梵蒂岡曾通令天主教会为华尔街这一奴役和掠夺欧洲人民的阴谋进行宣传。在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約签订以前，教皇曾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二日发表文告說：“我們欢欣而且贊同地欢呼这一倡议。”同年七月十三日，教皇庇护十二世公开采取干涉天主教居民的国家的国内政策的措施，下令将一切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开除出教。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七日，庇护十二世又进一步对駐各国紅衣主教、聖使及梵蒂岡人員發出指示，要求“无条件地拥护美国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利用天主教报纸宣传美国的政策”。对于为全世界人民所热烈拥护的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梵蒂岡和各国反动统治者一样，采取了公然敌对的态度。

梵蒂岡曾在西欧各国组织和领导反动的天主教政党，直接干预各国内政。一九四八年意大利大选时，梵蒂岡执行美国的命令，积极促使加斯貝利的亲美政党当选。在法国，以皮杜尔为首的天主教人民共和党在梵蒂岡的协助下成立，它的幕后领导人就是直接听命于教廷的曾经支持貝当卖国政府的許多主教。

与采取公开手段支持美国侵略政策、攻击民主进步力量同时，梵蒂岡还在各国进行着更为恶毒的隐蔽的間諜破坏活动。它和美国特务机关串通，共同从事以破坏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反动統治为目的的勾当。

二次大战結束以后，其欧人民民主国家首先成为梵蒂岡特务阴谋破坏的对象。大批受过特务訓練的神父被派到这些国家，从事种种破坏活动。一九四八年捷克斯洛代克的二月暴动阴谋中，天主教的显要們曾全力参与策划。一九五〇年三月和

十月兩次審訊教廷間諜案時，進一步暴露了梵蒂岡、紐約紅衣主教斯培爾曼、天主教集团在捷克國內組織偵探、暗殺和叛亂陰謀的真相。一九四八年二月，匈牙利破獲了以紅衣主教明曾蒂為首的叛國案，從主教宮廷搜出的文件和明曾蒂的供詞證明：早在一九四八年，他就在梵蒂岡指示下着手組織秘密的保皇組織，企圖發動政變，恢復那個奴役與壓迫匈牙利人民的哈布斯堡皇朝。他的計劃獲得美國積極贊助，明曾蒂供認：“我希望能仗着外國，首先是美國的援助，實現推翻共和國的計劃。”在保加利亞，一九四九年三月也破獲了福音教會最高理事會米哈依洛夫等十五人的陰謀恢復法西斯政權的叛國案。在阿爾巴尼亞、波蘭、羅馬尼亞，許多被揭發的實說明，天主教的許多首領們在梵蒂岡的指使下，都會積極地進行了公開地和秘密地反對民主政權的活動。而所有這些陰謀叛亂罪行的幕後贊助者和主使人，都是梵蒂岡和美國政府。

梵蒂岡甚至還和華盛頓進行了訓練間諜特務的合伙事業。一九四九年十月，梵蒂岡決定大規模成立間諜學校，分設意大利的羅馬、利弗諾、佛羅倫薩和斐拉拉等地，由美國使館的武官負責指領，杜魯門駐梵蒂岡的代表泰勒參與擬訂這一計劃。去年二月和十月，梵蒂岡曾兩次舉行教廷及美國特務機關代表的聯席會議，討論加強間諜工作和建立新的特務訓練學校的事宜。

梵蒂岡的魔爪不僅伸入東歐各國，而且也伸展到遠東和東南亞地區。中國人民革命和東南亞人民解放運動，成為梵蒂岡仇視和加緊破壞的對象。一九五〇年十月，教廷會在羅馬召集派到中國、朝鮮、越南、印尼的人員舉行會議，同時，還使用一切誘騙手段，吸收由遠東各國前往羅馬參加“聖年”朝拜的“香客”，參加梵蒂岡在遠東的間諜破壞活動。

梵蒂岡的罪恶活动在各国天主教徒和广大人民的面前，暴露了自己是人民的敌人和美帝国主义的帮凶。这就使它的影响一落千丈。它的反对共产党及其同情者的开除教籍令，在各国都遭到可耻的失败，意大利、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天主教徒，并没有因此而动摇拥护正义与和平事业的意志。在意大利共产党所领导的各个进步组织中，没有一个天主教徒放弃了对加斯贝利与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教廷的破坏阴谋一再被揭穿的人民民主国家内，天主教徒和所有人民群众一样，都极端鄙视那些出卖祖国、充当美帝国主义走狗的教会败类，他们忠诚拥护民主政府信教自由的政策。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去年都曾举行全国天主教士的大会，会议一致表示了广大的天主教爱国人士积极参加建设新社会和保卫和平事业而努力。

梵蒂岡已经把自己从热爱和平民主的正义事业的天主教群众中间孤立起来。它和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联盟，只能有一个结局，那就是彻底的失败。

今日教廷之投靠美帝

反动的教廷，在与它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上，一向是算盘很清楚的。它深知无论是佛朗哥或西欧任何罗马教国的反动统治者，今日在日渐壮大的人民威势前，已都无能为力，它看出唯一尚可对它有一时的实际帮助的，就是今日仅存的有实力可言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所以教廷虽然绝不会放过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机会，但它最大的功夫是用在美帝身上。今日的美帝是第二次大战前纳粹与法西斯的新的化身，是反苏反共阵营中唯一尚能得到实力的国家，教廷自然要像当初拥护

德意兩國反动势力那样地大捧美帝。兩者狼狽为奸的情形，今日虽尚未全部暴露，但有些表面現象的意义已經是非常清楚的了。我們現在只举一事为例，就是枢机主教名額新的分配情况。

按制度，握有选举“教皇”大权，平时等于教廷的国务院的枢机主教院，以七十名为籍額，但照例总有缺額。我們可以最后有詳細資料的一九四九年夏为标准，看看此时的名額如何分配于世界各国。当时全院共五十四人，其分配如下：

国 別	人 数
意大利.....	二一
法蘭西.....	五
美利坚.....	四
德意志.....	三
西班牙.....	二
葡萄牙.....	二
阿根廷.....	二
巴 西.....	一
加拿大.....	一
智 利.....	一
秘 魯.....	一
古 巴.....	一
其他十国.....	各一

最后一項，各占一位的十国，与我們現在所要研究的問題无关，从略；其中唯一值得我們附带注意的，就是中国也占一位，即一九四六年被任命的田耕莘，解放前他本駐北京，今日据聞他已到了美国。对于本題直接或間接有关的十二个国家，我們可分別解釋。意大利与法国的重要地位，完全是由于过去历

史的关系，在中古时代，教皇于某种程度上可說是全欧性的一个职位，任何人都可当选，并不限于意大利人。虽然因地理实际情形的关系，意大利人当选的較多，但欧洲其他各国的也确是常有陞任教皇的。但进入十六世紀后，情形大变，在資本主义开始抬头的局面下，民族主义的国家出現，教廷虽仍強調它的超国家性，但实际它无法不在相当重要的程度內成为一个意大利的机构。最后一个外国教皇是一五二二年当选的，次年即死，由一五二三年到現在，四百三十年的功夫，所有的教皇沒有例外地都是意大利人。解放后中国天主教中的帝国主义分子欺騙中国教徒的一种說法，說教皇是由任何国家天主教徒中都能产生出来的，那完全是鬼話。为保障教皇一定是意大利人，近代历史上历任教皇委任枢机主教时，即或意大利籍的人不达半数，最少也总超过三分之一，而教皇的选举是要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的，事实上絕无一个非意大利人出任教皇的可能。

法国的情形与意大利不同。自十七世紀中期以后，法国是欧洲大陆的第一强国，也是教廷的最大靠山，所以在意大利以外，法国的枢机主教名額一向是最多的。今日法国虽已沒落，但昨日历史的关系，一时尚不能全部否定，因而法国在枢机主教院中仍占第二位，但实际上已不發生作用。

在討論美国以前，我們先把意、法以外其他三个欧洲国家問題处理清楚。德国就全国范围而論，并非羅馬教国家，只是南德的人多数信馬罗教。但自十九世紀后期德国統一强大后，教廷对它非常重視，所以今日它在枢机主教院中仍占三个名額。西班牙与葡萄牙在欧洲是最落后的羅馬教国家，然而正因这些落后性是最为教廷与教会所欢迎的，教会在这兩國特別得胜，政治压迫与經濟剝削，都可暢所欲言。所以兩國在国际政治上虽无地位，在枢机主教的分配上却仍受到特別的照顧。

美国取得四个枢机主教的名額，在全院中占第三位，把意大利法蘭西兩國特殊国家除外，等于占第一位，那是历史上空前的現象，是第二次大战結束后的次年（一九四六）才發生的現象。美国自立国以来，一向以“耶穌教国家”自豪，一般人民在情緒上，統治人物最少在口头上，总是反羅馬教的。羅馬教的人数虽逐渐增加，在今日也不过占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强，进入二十世紀后，美国偶得一个枢机名額，那也不过是教廷敷衍的手法而已。然而时至今日，情形已經大变，美国的四个名額中，三个都是一九四六年填补的，完全是第二次大战后的新發展。并且可注意的事还不只此。美国以外的六个新大陆国家（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智利、秘魯、古巴）共占七个名額，按这七名都是一九四六年填补的，在一九四六年以前，整个的新大陆，包括美国在內，只有个枢机主教，与今日的情况无法比拟。二次大战后的今日，加拿大已等于美国的一部，拉丁美洲也完全是美国的外府，新大陆的十一个名額都等于是美国的名額。（一九四六年調整时新大陆原有枢机主教十三人，其中一人不久死去）按教廷的本意，它未尝不想把十二个或十三个名額都給美国，但对于一个基本上非羅馬教国的国家若如此优待，在面子上未免太觉难堪，所以它才想出这种使一向不被重視的拉丁美洲国家受寵若惊的巧妙方法，給了美国一个實質上如此大的額数。把意大利除外，外籍的枢机主教只有三十三人，而美国就控制其中的十一人，即百分之三十五以上，这真可謂是美国的“殊荣”了！第二次大战后世界各地人民高度上升的力量，特别是近在咫尺的欧洲人民的上升力量，使历史残余的教廷恐怖万分，环視全欧，已經沒有一个可靠的“护教者”，最后只有不顧一切，在大战結束的次年，就以調整枢机主教院的方式向“耶穌教国”的美帝表示投奔，呼吁救命了。

为蒙蔽世人的视听，冲淡世人的印象，它同时又在新大陆以外搜罗了一批“陪榜”的人，所以连宗教殖民地的中国教会竟也得列上一个田耕莘！

美帝之倚重教廷

但教廷美帝之间的关系，倒不完全是教廷方面的单相思，美国对于教廷也是深为看重的。美帝重视教廷的理由，简单一句话，就是钦佩它的阴谋传统与间谍本领。我们可引一九五〇年春美国一个著名杂志中的一段消息，作为对此问题的事实说明：

“最近杜鲁门总统要派遣一个新的驻梵蒂冈的总统私人代表……

“在宣布派遣新代表时，杜鲁门要向国会致送一件特别咨文，说明他为何要继续维持这个代表团，并且要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说，美国须在罗马设立一个“听音站”（Listening Post）的需要，今日与过去同样迫切，甚至较过去任何时期都为迫切。

“无论根据宗教原因杜鲁门对派遣驻梵蒂冈代表一事会有何种顾虑，这些顾虑已都因国务院的坚持此代表团为世界范围的情报搜集所必须的说法而被扫除……”

这段消息的意义清楚至极。美帝自然不会嫌帮闲或帮凶太多，但对一般的反动工作，它自己大概都认为颇有把握，不一定非拉人入伙不可，美帝唯一对教廷要自嘆弗如的，就是历史悠久传统坚实的阴谋策略与间谍技术及其无孔不入的行动便利。在罗马教国或罗马教区，处处都是中古封建领主化身的高

級教士与修士，在非羅馬教地帶，也几乎处处都有各形类的信仰教廷的傳教士。这些人有計劃地或无所謂地，經常地或直接地、間接地，都有情报送到梵蒂岡。美帝雄心再大，它的雄心在此上也无法尽量施展，除非与教廷密切勾結，向教廷甘拜下風，它自己是无法建立一个真正籠罩世界的情报網的。所以它在教廷情报網的中心，梵蒂岡宮，必須有一个“听音站”，充任“站員”的就是所謂总统私人代表。第二次欧洲大战爆展的当年（一九三九）十二月，美国总统就派了一个私人代表到梵蒂岡。这在当时，为的是便于听取与战事有关的軍事外交消息。大战结束后，一向反羅馬教的一般美国人民与他們在国会中一部比較进步的代表，都反对再繼續維持这个代表团。杜魯門一时也曾犹豫不定，但金融資本軍閥、与官僚势力重心所在的国务院，坚持非維持这个代表团不可。国务院是花旗牌的帝国主义，即世界主义的执行机关，为推行世界主义所必需的情报，它認為只有借重教廷方能取得。一九五〇年国庆日炮击天安門的武裝暴动阴谋，参加的一伙中就有身膺主教头衔的“羅馬教廷駐华公使”的“北京代表”馬廸儒，全部計劃事先都會送給駐东京的美国占領軍总部，我們也可相信，总部也必會把消息轉到华盛顿。美帝与教廷特务工作的打通，在这个罪大恶極的案件中揭露无遺了。这絕不是偶然的或例外的，今日在世界各地，教廷与美帝无不形影不离地同干反人民的破坏勾当，梵蒂岡与华盛顿已成了反人民事业的兩個声气相通的大本营。

“教宗”歡喜若狂地贊成美國的侵略政策

在郭發，在巴伐利亞所發行的西德“*Франкенпостен*”日报本年九月十五日写道：“施特拉斯堡举行的矿业及工厂联

盟和欧洲會議，关于欧洲防御同盟条約的爭辯以及同时实施的軍事訓練等迫使教宗庇护第十二对于保衛和平問題和对于防御西欧問題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在西欧巡礼者們觀見时，“教宗”表示他自己确信，欧洲的統一（即著名的剝夺各西欧国家的宗主权并使他們附屬于美国总督的美国計劃。）可能是保衛和平的手段。“成立統一欧洲的机构——“教宗”繼續說——乃是对各人民之間关系的新途徑之前提。此項前提，——“教宗”惋惜地附加說——尚未成为事实”。

我們也可以添一句：由于西欧各国人民的反抗，未成为現實的亦将永远不会成为現實，無論你这美国資本家的順从奴仆梵蒂岡怎样惋惜。

梵蒂岡與美帝國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梵蒂岡一面执行巩固法西斯政权的政策，同时又向美国統治集团献媚。匈牙利霍尔蒂政府駐梵蒂岡使节巴尔查曾經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梵蒂岡对美国的態度。巴尔查說：“也許梵蒂岡認為美国是最有声望的国家，凡是美国所願望的，梵蒂岡无不竭力办到。美国人表达这些願望时，往往致送教会所需要的相当数量的款項”。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美国总統罗斯福派遣梅隆·泰勒为駐梵蒂岡的私人代表，因为根据宪法中政教分离的規定，美国政府是不能与“教皇”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泰勒在梵蒂岡受到“教皇”的特別招待，經常举行秘密會議。这个总統駐梵蒂岡代表的职位（大使銜），一直保持到战后。梅隆·泰勒是美国大資本的代表，他与摩根銀行有密切联系，做过美国最大的“鋼鉄托拉斯”的經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日法西斯失敗，世界反动勢力中心轉到了美国，梵蒂岡便轉而追隨美国。

一九四五年梵蒂岡电台宣告說美国是現在唯一能領導世界的国家。美国金融集团喉舌“華盛頓郵報”提出了几个理由，說明美国必須与梵蒂岡合作。第一、美国已經牽入了欧洲的事務，所以在欧洲政策上必須利用梵蒂岡的影响。第二、美国与梵蒂岡都具有謀求欧洲大陆政治、經濟平稳的目的。

一九四七年杜魯門与庇護十二交換函件，杜魯門吁請“教宗”协助实现馬歇尔計劃，“教宗”表示通力合作“安定欧洲秩序”。一九四八年四月，報紙报道，“教皇”与泰勒签订了秘密协定。这个协定的主要内容是要加强对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斗争的共同綱領。“教皇”庇護十二世訓命在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主教們，将任何具有反共意义的情报供給当地美国大使館。同时，梵蒂岡的情报組織也予改組加强，特聘美国耶穌会领导人麦克米克和格雷哥利大学教授福特为梵蒂岡情报組織的常任顧問。为了执行这一协定，梵蒂岡曾召开了一次十二名紅衣主教的秘密會議。斯塔爾曼也参加了这一會議。

一九四九年七月，梵蒂岡追隨美帝国主义反苏反共的战争政策，而公布了所謂开除教籍的命令。命令中規定对積極追隨共产主义思想主张的人，开除教籍。

在通过“馬歇尔計劃”的时候，梵蒂岡曾極力为之宣揚。“馬歇尔計劃”宣布不久，十二个紅衣主教在梵蒂岡召开秘密會議，会后宣布：教会認為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手段都是正当的。

在北大西洋公約签字以前，“教皇”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的文告里說：“对于这个用最密切的联系把各国团結为一个联盟的倡議，我們欢欣而贊成地的欢呼”。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七日教皇庇護十二公開發表“詔書”，要求“所有在欧洲各国的主教，教皇使节和梵蒂岡人員都須无条件地拥护美国所采取之任何措施，利用报纸宣傳美国的政策”。当时柏林日报說，教皇的文告系根据美国与梵蒂岡的秘密协定而發。依照这个协定，梵蒂岡要在許多受美国的影响的国家中担任“精神管理”。梵蒂岡新聞处处长蒙德格尼亞表示，将特別訓練一批神甫到东欧去作間諜工作，美国特务将监督这种訓練工作，而梵蒂岡則参与訓練美国外交人員。

一九五四年末巴黎协定在法国国民議會会表決时，也曾受到梵蒂岡的压力和干預。据当时每日邮报报道：“梵蒂岡通过羅馬駐巴黎代表和法国的紅衣主教，对法国天主教党——人民共和党施加压力，要他們支持巴黎协定”。路透社电訊透露，教皇对人民共和党許多議員投票反对巴黎协定一事感到“痛苦的惊愕”，并要求他們“不要作出危害大西洋团结和西方防御的事情来”。

梵蒂岡与美帝国主义关系的密切，还表現在美国人担任梵蒂岡內部职务的增多。梵蒂岡派駐各国使节中安插了許多美国人。如派駐西德的“教皇”代表是美籍主教孟克，派駐南朝鮮的教廷代表团首席代表是美籍神甫比尔思。在紅衣主教名額中，一九四六年美国（新教国家）已由一名增至四名，仅次于作为天主教国家的意、法兩國。

梵蒂岡與美國操縱聯合國

根据联合国某高級人員在“紐約指南針报”（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上匿名所写的，“联合国崇拜的上帝是一位位于羅馬天主教的美国耶穌教徒”。当然主持一切的是美国人。

（秘書厅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員是美国公民），由普萊斯（Byron Price）負責事先了解工作部人員的情況，并掌握預算、管理建筑、計劃、审查以及各种使团的对外工作（例如派赴朝鮮的使团。賴伊是联合国对外搪塞的人，而实际工作是由一个美国人狄耳（Andrew Cordier）来做的。他“操縱大会”；“监督一切政治政策的执行”；还有，譬如“主持全部朝鮮問題”。另外一个美国人費拉（Abe Feller）是秘書长的合法顧問。就是他告訴賴伊如何使一件事情合法，如何故意制造漏洞，例如卖弄文字，使外行人看来朝鮮事件与联合国宪章并不违背。联合国的人們常講美国人如何向他們駐联合国的大使銜的代表們提意見，不滿意自己所处的地位，結果就居然扭轉了既成的事实。毫无情面可言。奉命收回前言的代表們就得被弄得像挨了打的小学生一样。本文作者提及每个代表都必須遵守的基本的反苏路綫时說：“向这方面推动的强大力量是羅馬天主教会，他統治着二十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以及菲律宾、荷蘭、澳大利亞、加拿大、比利时、盧森堡的投票。在这件事情上，教会和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并行的”。他們可真是并行的！

梵蒂岡支持和執行美帝國主义的各項反動政策

1936年11月梵蒂岡国务卿派契利（即現在“教宗”）赴美国，目的是要为和該国建立外交关系作准备，并与美国資產阶级統治集团發生个人联系。派契利在美国时，就住在銀行家布雷德的公館里。“教皇”曾封布雷德的妻子为公爵夫人。

1938年底护十三世賜于美国摩根金融集团的首脑約翰·皮尔彭·摩根以梵蒂岡勳章。

1939年7月加斯坡里枢机主教抵美，为“华盛顿与梵蒂冈之間可能开始外交关系的法律地位”作准备。

同年1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經紐約大主教斯培尔曼的推荐任命梅隆·泰勒，耶穌教徒，为駐梵蒂冈的总统私人代表。

〔注：泰勒是美国垄断資本集团的代表，他与摩根銀行有着密切关系，做过美国最大的鋼鉄托拉斯“美国鋼鉄公司”的經理。他是墨索里尼的崇拜者，他特別贊成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亞的行为。〕

1941年10月泰勒将自己在意大利的一所价值五千万美元的別墅送給了“教皇”。

1943年4月紐約总主教好战分子斯培尔曼赴羅馬，代表紐約教区送交“教皇”五万美元。

1946年2月底庇护十二世在一个大张旗鼓攻击共产党的宗教會議上設立了32个新枢机主教。其中美国主教占有四席之多。

1947年8月泰勒帶給教皇一封美国总统杜魯門的亲笔信，信中說的是在反民主的斗争中及在实现美国反动的帝国主义計划中美国与梵被岡合作的計划。庇护十二世在其复信中表示贊許“杜魯門主义”，并同意天主教会与美国統治阶级实行合作。

1948年4月报載美国通过总统駐梵蒂冈私人代表泰勒和梵蒂冈簽訂了一个密約。根据这个密約，美国有义务协助全世界天主教神职界以及梵被岡代理人的宣傳工作，特別是反人民民主国家的宣傳工作。

同年9月斯培尔曼献給教皇五十万美元作反共經費（梵蒂冈电台9月28日广播）。

同年11月梵蒂冈将法国女皇于1869年送給教皇的一千股苏伊士运河公司股票卖給美国政府。美国对这批股票久已蓄意收买，促成这件交易的是美国总统駐梵蒂冈私人代表泰勒。

1949年2月梵蒂岡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出席會議的有當時正留在意大利的紅衣主教。據民主報紙載稱，這一會議與梵蒂岡所進行的反對民主組織的“十字軍”運動有關。

同年7月13日梵蒂岡聖職部發布命令：凡是共產黨員，或支持擁護共產黨的教徒，凡是傳播共產黨的刊物的教徒，全部要開除教籍。

同年10月教皇以梵蒂岡最高勳章授給美國戰爭販子的頭子之一赫斯特（美國報紙大王，出名造謠專家）。教皇還對赫斯特的“善行”致以“使徒的祝福”。

1950年3月17日庇護十二世公開發出通諭，要求歐洲各國主教、教皇使節和梵蒂岡人員無條件地擁護美國所採取的各項措施，利用天主教報紙，宣傳美國的侵略政策。

同年6月25日在美帝國主義的慫恿和支持下，南朝鮮李承晚集團向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邊境發動全綫進攻。美國隨即和16個國家參加侵略朝鮮的戰爭。美國天主教會派了大批隨營司鐸，隨着美國陸海空大軍，直接參加了侵略朝鮮的活動。據1953年宣布，在隨營主教管轄下的有1,924名隨營司鐸。天主教隨營司鐸死亡的消息，不斷地在天主教報紙上發表。在漢城，還建立了以鮑恩主教為主的美國和梵蒂岡聯合情報中心站。

同年12月據紐約時報錫安法拉稱：庇護十二世支持以重新武裝西德為基礎的大西洋公約。

1951年7月10日在朝中部隊沉重打擊和全世界人民壓力下，美國被迫與朝中方面談判停戰。

同年12月紐約紅衣主教斯培爾曼在聖誕節前趕到南朝鮮與美國侵略軍聯歡，以鼓舞士氣。在離火綫三哩的地方，露天舉行三台聖誕大禮彌撒，祈求天主聖嬰速賜美帝國主義所謂“正義的和平”。

派契利之死和朗卡利上台前后

派契利之死和朗卡利上台前后的种种特色，正在不断地透露出来。这里谈的材料虽是不完整的，但已经看出，在近一个时期梵蒂冈勾结帝国主义，敌视新中国的丑恶面貌。

（一）派契利的“人格”

1939年派契利上台的当天便写信给“满洲国”皇帝溥仪表示友好亲善，支持日寇侵略我东北领土开始，直到1958年派契利为配合美帝国主义扩大对我国的侵略而向中国天主教友所发出的那个最后反动“通谕”为止，充分证明派契利在位20年中，无时无刻不在敌视中国人民，作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难怪在派契利死后，艾森豪威尔加以痛惜，并为派契利粉饰，说他是“被压迫者之友人和保护者”，“不断拥护和平之大义”；而杜勒斯也亲自出马参加派契利的丧礼，并极口称赞派契利的“人格”了。正因为派契利终生作了中国人民的死敌，作了美帝国主义的孝子贤孙，才博得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称赞，派契利“人格”才为美帝国主义所景仰。

（二）“教皇选举”前的幕後斗争

派契利死，帝国主义国家都忙碌了起来，派出了他们的代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意大利总理范范尼，法国和西德的外交部长等，都急急忙忙赶到梵蒂冈。他们的目的，不独是为派契利“吊唁致丧”，更重要的是要对梵蒂冈的宝座进行一场争夺战。杜勒斯虽然有着迫切去台湾同蒋介石会谈的“公务”在身，也未辞此番直接影响选举的辛苦。帝国主义之间从来是矛

盾重重，勾心斗角，这次杜勒斯的奔波就更加剧了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幕后斗争。

杜勒斯离开罗马不久，梵蒂冈的52位红衣主教以“严密的手续”于10月25日开始选举新教皇。提到“严密手续”，尽管梵蒂冈极力躲闪，大肆宣传，但无论如何也终久不能解说出教皇难产的理由。坦率地说，连“梵蒂冈问题专家”也不得不承认：“1958年的教皇选举，具有一种明确的政治意义”。

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派契利曾一下“赐予”美国五个红衣主教，自此美帝国主义就从本来没有红衣主教一躍而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红衣主教最多的国家，仅次于意法两国。但是，派契利的“祝福”并没有使天怒人怨的美帝国主义变得“吉利”起来，在归途中死了一个，1958年又連死了两个，一个是前任梵蒂冈傳信部副部长美国芝加哥总主教史特烈，一个是这次已经到了罗马未及参加选举就一命呜呼了的摩奈，这一来，美国的红衣主教仅剩了兩名，大大削減了活动力量，确实是美国在竞选教皇中“痛心的損失”。难怪艾森豪威尔为摩奈之死“伤心”，也难怪杜勒斯之所以要亲自出馬上陣了！

在开始选举教皇以前，美国曾向匈牙利政府提出过无理要求，要允許躲在布达佩斯美国公使館的反革命分子、匈牙利事件的罪魁之一——明曾蒂赴罗马参加选举。

号称“首任中国枢机”的田耕莘，以“国民党中国主教”身份，冒“北京总主教”之名，乘抬架进会场出席，屈居末位，参加了选举。台湾是想借这“活宝”討好美国老板多掙几塊美金，而美帝則正好利用这頂“紅帽子”以爭得最后优胜权，他們心照不宣。

选举一开始，某些红衣主教掀起了一个选非意大利“教皇”的运动，声势頗猛。一个被苏联人民久已逐出境外有几十年的

“亞美尼亞”紅衣主教阿季节安尼安，在他的朋友，意大利总理范范尼和代表着富足的紐約天主教堂、控制着南美与意大利一些选票的史特烈等的支持下，大肆进行竞选活动，同他們对立的是那些反对破坏 400 年来都是意大利人当选教皇的傳統的紅是主教們正在斗争得很激烈的时候，美国紅衣主教摩奈突然死去，只剩了51个。

經過十多天的明爭暗斗，才把一个行将就木的七十七岁的威尼斯总主教朱賽佩·朗卡利登上了“教皇”宝座。他被称为是“一个政治和外交手腕很出色的意大利主教”。

（三）朗卡利登上“宝座”之后

朗卡利当选教皇的消息刚一發表，戴高乐和艾森豪威尔就立即电致賀，表示“满怀欣悅”和“極大喜悅”，这不是沒有来由的。

（1）看看朗卡利过去干了些什么

从朗卡利近半生的活动說，他从34岁那年就在意大利皇帝爱麦爱虞的軍隊中充任連长（附圖为朗卡利充任連长时的照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登上政治舞台。1925年被派遣駐保加利亞教廷公使，十年后，又任过駐土耳其及希腊教廷公使，1944年受派契利委任为駐法国大使。在他上任剛一抵达巴黎的当天——1945年元旦晚



上，便迫不及待地帶領教廷特使團赴愛利賽宮拜見戴高樂祝賀年禧，並呈遞國書，宣誓效忠。朗卡利在“祝辭”中百般獻媚，獨裁首腦戴高樂反動的血腥統治是“尊嚴和權威”的表現。自此兩人“情同手足，交情甚深”。後來，派契利應國之“請求”，提升朗卡利為紅衣主教，使彼此間的“友誼”更加深厚。1953年1月15日，朗卡利就從法國總統奧利沃手中跪領了紅衣主教的帽子（見本頁附圖）並向法國國旗伏拜致敬，厚顏無恥地保證“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將永遠是法國統治者“最忠實可靠的朋友”。



在朗卡利舉行效忠法國統治者的儀式的前一年——1952年6月，曾被派契利任命為宗座駐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協會的永久監督，11日他在該會的一次大會上講道中號召歐洲教友“建立一個符合庇護12世的原則的世界”，就是要堅決執行美國侵略者的“大西洋侵略集團”的實力政政。

1953年，當派契利回到意大利威尼斯時，便又與教廷國務卿意大利紅衣主教蒙蒂尼聯袂組織所謂“保守派”，與史培爾曼仇恨社會主義的“右傾

“極端派”相映襯。

所以人們从历史的証据里看到：今天要人們口亲的朗卡利的所謂“神聖的脚”就是当初踐踏过无数死难者屍体的鉄蹄；今天高举要向人們“賜福的手”，当初沾滿了无辜的鮮血至今未干；昨天还是意大利皇帝爱麦爱虞手下的凶橫武夫，今天却搖身一变平地成“佛”，竟是“永不能錯”的“基督代表”了。

(2) 郎卡利千方百計为帝国主义效劳，反对民族民主独立运动

美帝国主义早对匈牙利叛国分子明曾蒂鍾情，明曾蒂借匈牙利反革命叛乱而逃往美国大使館后，美帝国主义就此大作文章。朗卡利上台以后，也和美帝国主义呼应起来，对明曾蒂的叛国罪行，表示“極度感动与敬佩”，并賜予明曾蒂“特殊的宗座退福”。同时，他更非常重視派契利与意大利政府“携手”收容在梵蒂岡的大批匈牙利反革命暴乱分子和对他們的訓練工作，因此特地为他們盖起一座大厦集中进行“培养”，以便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进行顛复活动。

梵蒂岡的經濟收入主要是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它在加拿大以及南美洲等地的剝削掠夺。但是近几年来，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民主独立运动蓬勃發展起来，巴拿馬、阿根廷、薩尔瓦多、秘魯、尼加拉瓜、海地、哥倫比亞，危地馬拉，委內瑞拉、古巴等国的独裁政权已先后垮台。当然，在拉丁美洲拥有难以数計的股票、龐大的企业辽闊的农田和园林的梵蒂岡，对于这种反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成长是不甘袖手的。朗卡利登台不滿一周，即（11月10日）急忙召开“拉丁美洲各国主教会议”。会议由巴西首都总主教（紅衣主教）主持，討論有关“拉丁美洲教会的未来問題”，即研究梵蒂岡在南美洲的資本壟断权和反动統治政权的存亡問題。美帝国主义对于这个

會議自然是極度重視。

在朗卡利心目中，物色一批最能忠于帝国主义利益的反动奴才，冠以紅衣主教的头衔，在宗教长袍的掩护下进行顛复活动，是件很重要的事情。1958年11月17日朗卡利在繼承派契利生前就已布置好的首次御前會議上，破例地任命了23个紅衣主教，使所謂“神聖集团”扩大到75名。而在提升的23个紅衣主教中，意大利得到了14頂紅帽子，美国則弄到兩頂，白宮方面对此表示“非常滿意”；法国政府也同样表示：“極大的荣幸和感激”，余下的五頂紅帽子則由德、奧、英、墨西哥、烏拉圭五国分掉了。而在这五頂中有兩頂是拉丁美洲国家的。这正是郎卡利在結束“拉丁美洲各国主教会議”后，为支持和鼓励反对拉丁美洲民族民主独立运动的“敬意”和“礼品”。不言而喻。朗卡利提升23个紅衣主教的目的，正是表明帝国主义再一次利用宗教手段作垂死的掙扎。

（3）郎卡利为意大利法西斯招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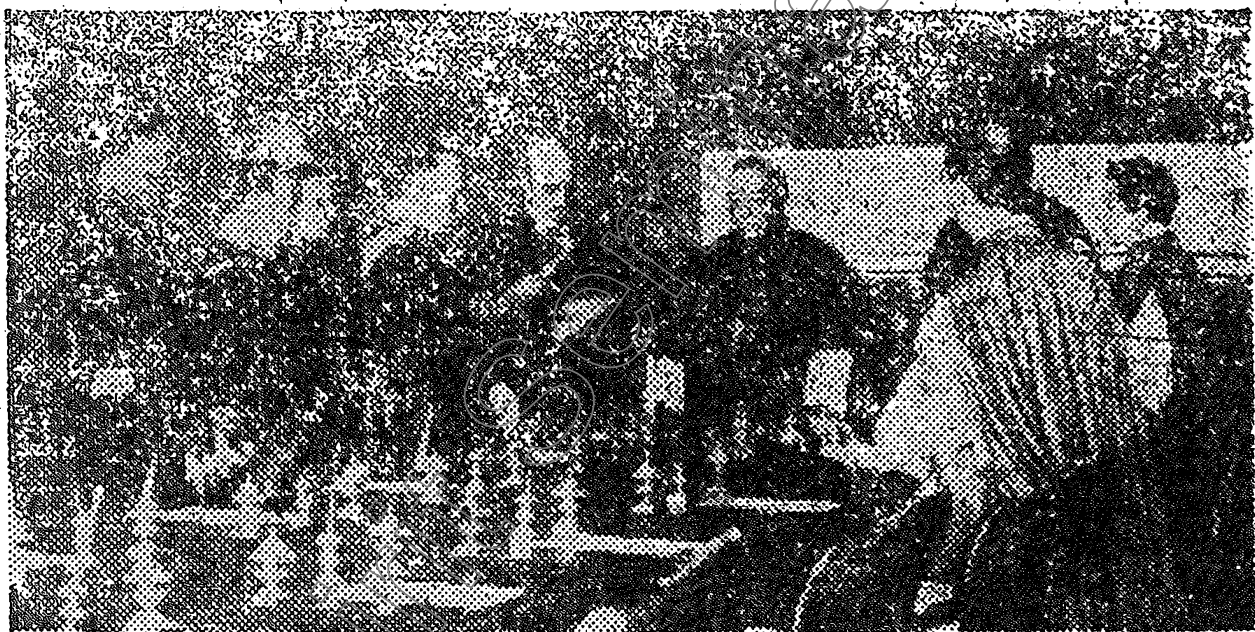
1959年1月16日朗卡利特地到梵蒂岡国务文書庫中找出了庇护十一在1939年临死那天想向意大利全国主教發布的关于“庆祝拉特蘭条約簽訂十周年”的講演手稿，爱不释手地一气讀完以后，“非常激动”，并向意大利主教發出公函，極力贊揚庇护十一的“爱国”精神，更大言不慚地称道这个突名昭著的拉特蘭条約是一个“偉大事件”。

自从梵蒂岡与法西斯墨索里尼簽訂“拉特蘭条約”之后，不断叫囂“教会和意大利兩大权威合作”，高唱“天主聖名”在法西斯党中得到贊揚”在1936年正当法西斯軸心国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比約十一竟明目张胆地“庆祝”他同意大利法西斯的协手同盟，举行了所謂“条約簽訂七周年紀念”大会，并乘机發布反动命令，要意大利各教区的主教把金銀祭

器，捐献给法西斯政府作为侵略战争的经费，去购置枪炮屠杀人民。至于朗卡利也早在1954年坐镇威尼斯的时候就为条约的签订举行过“银庆纪念”并发表反动演讲。1959年朗卡利刚当教皇就举行起“三十周年纪念”来了。

拉蒂、派契利、朗卡利热衷于“庆祝”“纪念”“拉特兰条约”，究竟葫蘆里是什么药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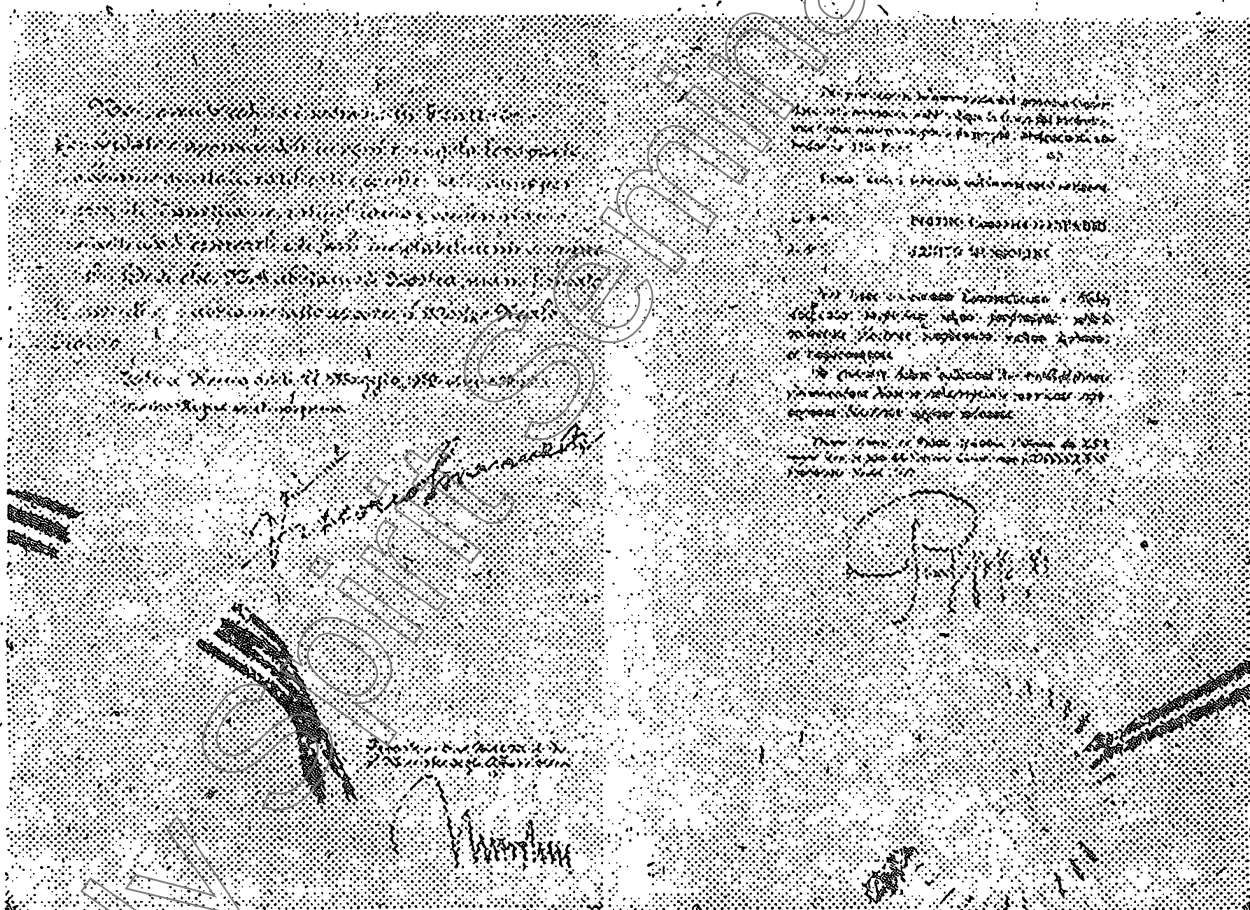
当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在1926年刚一登台执政时，为“表扶植教皇成立教皇国作为他进行侵略的工具”，便采取秘密方式与比约十一谈判。双方谈判的全权代表集会达203次，直到今天，梵蒂冈始终未将全文公诸于此。



1929年2月11日加斯巴利红衣主教与墨索里尼订立拉特兰条约。

到1929年2月11日，墨索里尼同教廷国务卿加斯巴利在梵蒂冈的拉特兰宫内亲手签订了条约。这拉特兰宫就是1200年前教皇良3世在这里将任命主教的特权交给了当时统治欧洲人民的法蘭克王查理大帝的所在。此番墨索里尼签订条约的主要目的是：在“政教协定”的名义下，规定意大利国内的总主教、主教需由法西斯政党任命，并签订主教们“在国家元首而制的

宣誓仪式”。这个规定就是要墨索里尼所中意的人来掌握教会大权，使意大利天主教会能更好地为法西斯尽忠效劳；而梵蒂冈所以对此百般唯诺，俯首从命，原因是在条约中还规定了：在梵蒂冈“独立国”的全部“警卫工作”由意大利政府的警卫维持，它的一切交通、电讯、邮政设施等，也均由意大利代为建造，在陆运、航运机航空事业方面，包括梵蒂冈的领空权，意大利得享有“互惠条例”，另外还成立一条“专款”以“订明引渡罪犯及处置罪犯之互助方法”。这仅是严密中的缝隙，可是已十足地说明梵蒂冈与法西斯是二而一的问题。法西斯失败十几年，朗卡利仍为它哭幡招魂，日思梦念，依恋在心，实指望能死灰复燃。法西斯崩溃了，而梵蒂冈的心却没有死呢。



庇护十一和墨索里尼分别在拉特兰条约上签字

(4) 朗卡利与岸信介交往

自朗卡利上台后，岸信介以日本首相之“尊”，仆仆风

塵，从倫敦、波恩、維也納在羅馬下榻三天經巴黎而南美……朗卡利为使岸信介洞曉他在梵蒂岡心目中是一个重要和值得尊敬的人物，特地从岡道尔福行宫返回了梵蒂岡并于1959年7月21日接見了岸信介，表明梵蒂岡与日本軍国主义之間的进一步“团结友好”。这对岸信介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安慰，因为他在倫敦受到了婉言謝絕，在波恩失去“軸心国”的老交情，在維也納也只能是把酒消愁，在羅馬連一个銅板的生意經也沒談成，唯有在梵蒂岡得到了优厚的礼遇，致使岸信介感激地說：

“日本民族对历来教皇向日本經常表示的同情和异乎尋常的諒解，并不失任何机会給予宝貴的支持与合作，是銘感肺腑的。今若望二十三閣下也是同样的，上任之初即表示了对当前日本問題的極大关心。今春閣下祝賀皇太子結婚的賀件，深深感动了日本民族”。他确信日本与梵蒂岡的关系将“永远密切、更融洽”。真是青出于藍而胜于藍，朗卡利比他所謂“不朽的前任”派契利确实棋高一筹，連日本皇太子娶亲，他也以“外交出色”挤进一脚。此番不料，梵蒂岡一向在一般教友面前企圖穩瞞和粉飾的事实，却由岸信介和盘托出了。但朗卡利并不以为然地給岸信介以“肯定”的回答并表示“滿意”。秘密一經揭开，人們就增加一个知識，那就是在朗卡利的朋友名单中，又多添了岸信介。

（四）朗卡利上台后繼續进行反对新中国的陰謀活動

（1）給中国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打气

朗卡利剛一登台就在所謂首次“御前會議”上犬肆叫囂，發表反动演講，把翟光華、龔品梅等一小撮反革命叛国分子称道是“福音的和平使者”，更指示他們的爪牙“要团结一致，”“勇敢奮發”，切勿悲觀”明目張胆地要这些反动分子繼續进行反人民的罪恶勾当，企圖在中国天主教中煽起一股反党、

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了妖風，以配合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反动幻想卷土重来役中国的美梦！

（2）利用“祈禱”搞阴謀活动

在朗卡利举行“加冕礼”后20天，曾利用保祿归化日作“特殊之祈禱”，蔣邦“駐教廷公使”謝寿康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人員也在一齐参加了“祈禱”并为此而向朗卡利“致謝”。台北华山天主堂在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的主持下也举行了同样的“祈禱”。朗卡利的“祈禱”煞有介事地对我国进行誣蔑和誹謗，說人民中国的情况还在“恶化”。事实上，中国人民公社發出的“总路綫万岁！大躍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的欢呼声，有力的回答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的无耻叫囂。

（3）指示战犯于斌加强間諜活动

在朗卡利策划的新的政治阴謀活动中，战犯于斌負有特殊的使命。他奉美帝国主义和朗卡利的意旨，携带秘密計劃飞往东南亚条約总部駐在地曼谷进行活动。1959年3月里由曼谷飞台大北，冒“南京总主教”的名义，恬不知耻地在“国民代表到会联誼会”上以“反共老手”自居，公开傳播反人民的“經驗”強調在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活动中不容忽視的宗教力量的“重要性”。

因此他請求到会的人：“研究研究天主教”，借以扩大反动影响。他借“訪問”、“演說”和“旅行”的机会，到处活动，大放厥詞，企圖搜集各式各样的叛匪、恶棍、杀人犯以充当反苏反共的急先鋒，为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謀尽忠效勞。他进行了一連串的活动之后，又到东京开始了另一次反动活动。1959年5月11日，他应南朝鮮李承晚邀請，由东京抵达汉城，和南朝鮮卖国賊李承晚之流以及天主教反动份子举行

了“会談”。随又經馬尼拉于18日返回西貢。尽管这个梵蒂岡的秘密使者。杜勒斯的反共專員对他的一切都严加保密，但他詭密行跡和“反共老手”的供認已完全傾出他此番“旅行”的主要任务：加强曼谷——台灣——东京——汉城——西貢間的間諜網，完成梵蒂岡在東南亞情报中心站的任务。

(4) 朗卡利利用西藏問題反对新中国

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利用西藏上層少数反动分子的發动的叛乱在国际上掀起反共反华浪潮的时候，朗卡利也叫囂西藏叛乱是“新的匈牙利事件”，說什么西藏叛乱的根源是由于“基本权利受到損害”，更別有用心地把所有一切利用宗教的反共反人民的勾当，說成是“聖战”，配合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演出的一幕丑恶双簧。現在西藏叛乱早已徹底平息，人民开始过着新的生活，梵蒂岡日夜等待的复辟已成白日做梦，“聖战”就是这样的可耻下場！

×

×

×

朗卡利上台前后种种仅是一个序幕。然而这已进一步証实了梵蒂岡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御用工具。我們对帝国主义不能有任何幻想，对梵蒂岡也同样不能有任何幻想，死去的派契利也罢，現在的朗卡利也罢，我們对付它們的措施就只有一条：团結起来，坚决地向梵蒂岡进行斗争，揭露和粉碎梵蒂的一切阴谋！